

Philanthropy
Topic Brief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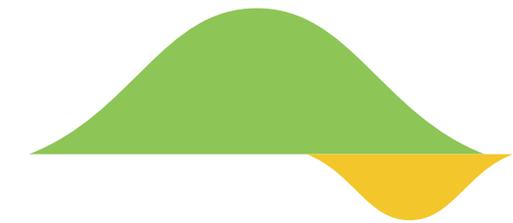
公益领域 通识



12

乡村振兴

[主编] 朱理





序

人类思想的进步有赖于知识积累。知识能否得到系统的梳理和传承，不但是发展的基石，更是检验发展水平的重要窗口。每个学科和领域的知识，经前人不断的学习理解，其内涵和本质变得愈加明显、表达形式更易于接受、总结更清晰扼要、训练更科学合理。当后人学习新的已有的知识时，效率就会提高，可以在原有发现的基础上，更好地开拓未知领域。因此，在成熟学科和领域中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那些曾经极其难以理解和学习的事物，在今天成为了非常普遍且方便学习的知识。人们因此可以站在他人的肩膀上眺望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实践。但无论一个行业还是一个组织，当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继续一刻不停实践的边际收益也会随之递减。这时更需要对过往进行梳理和总结。2021年，三一基金会（下简称基金会）遍访全国23座城市，与超过1000名公益从业者开展交流。在交流中发现，许多领域都欠缺成熟的技术资料。当新人进入领域工作时，普遍需要独立摸索，通过非正式的询问、实践、参加会议等方式零散地积累经验，往往需要2-3年才能对领域有相对全面的了解。因此，基金会萌生了支持细分领域总结通识性资料的想法。

2022年，基金会正式启动《公益领域通识》（下简称《通识》）的开发工作，于残障、养老、支教、性教育、自然教育五个领域开展首批试点。《通识》旨在帮助读者快速建立对细分公益领域的全面认识，了解领域发展现状，特别是领域常见或重要的思想、方法、工具、资源等。相关组织也可使用《通识》作为新人入职学习材料，从而减少人员培训成本，将时间用于更多创造性的工作。

在《通识》编写中，基金会采用了新的知识生产流程。基金会会在每个领域选择了一位拥有良好专业能力的专家作为合作主编，按照如下流程进行开发：

流程	内容
领域分享会	各主编以“领域通识”为主题进行介绍和交流,彼此听取不同领域的思路、架构、重点等,相互启发。在介绍的基础上共同讨论好的领域通识的目标、功能、结构等关键问题。
合作确认	分享会后说明权责关系及编写时间表,主编与基金会相互确认是否参与编写。
编委组建	每个领域由主编和基金会共同遴选邀请 5-10 名编委,编委大多为该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或头部组织的负责人。
初稿撰写	主编依据分享会思路编写初稿。
试读反馈	由基金会为每个领域公开招募 30-40 名志愿者对初稿进行试读。志愿者以多样性为核心进行遴选,可能包括该领域的工作者、专家、资助者、学生群体等。志愿者依据要求对初稿试读后进行书面反馈。同时编委对初稿也进行书面反馈。
第二稿撰写	主编依据各方反馈编写第二稿。
研讨会	由基金会组织召开研讨会,研讨会约 7-9 人,包含 2-5 名编委及根据各领域特点邀请的嘉宾,通过线上会议提供反馈。
第三稿撰写	主编依据研讨会反馈编写第三稿。
统稿	基金会对稿件进行排查,避免稿件中出现明显错误或风险。
定稿	领域通识稿件确定。
成册	基金会对稿件进行统一校对、排版、设计、印刷等工作,并与各领域主编共同发布《通识》,推广使用。

为促进编写质量,基金会帮助主编组建编委团队,并组织多次试读研讨收集建议。为提高效率并让主编拥有充分的编写空间,基金会并不参与内容的编写制定,主编在考虑各方面建议后,有权决定最终《通识》中所包含的专业内容。基金会希望这种新的尝试能在专业、效率、实用性和成本之间实现有效平衡。

中国慈善事业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便有文字记载,先秦诸子对慈善思想各有精妙论述,随后的历朝政府政策、佛道典籍、文学艺术,乃至民间杂谈也有详实记录。我国现代公益事业发展时间虽短,但过去数十年间亦涌现出诸多精彩论辩,各领域也多有卓越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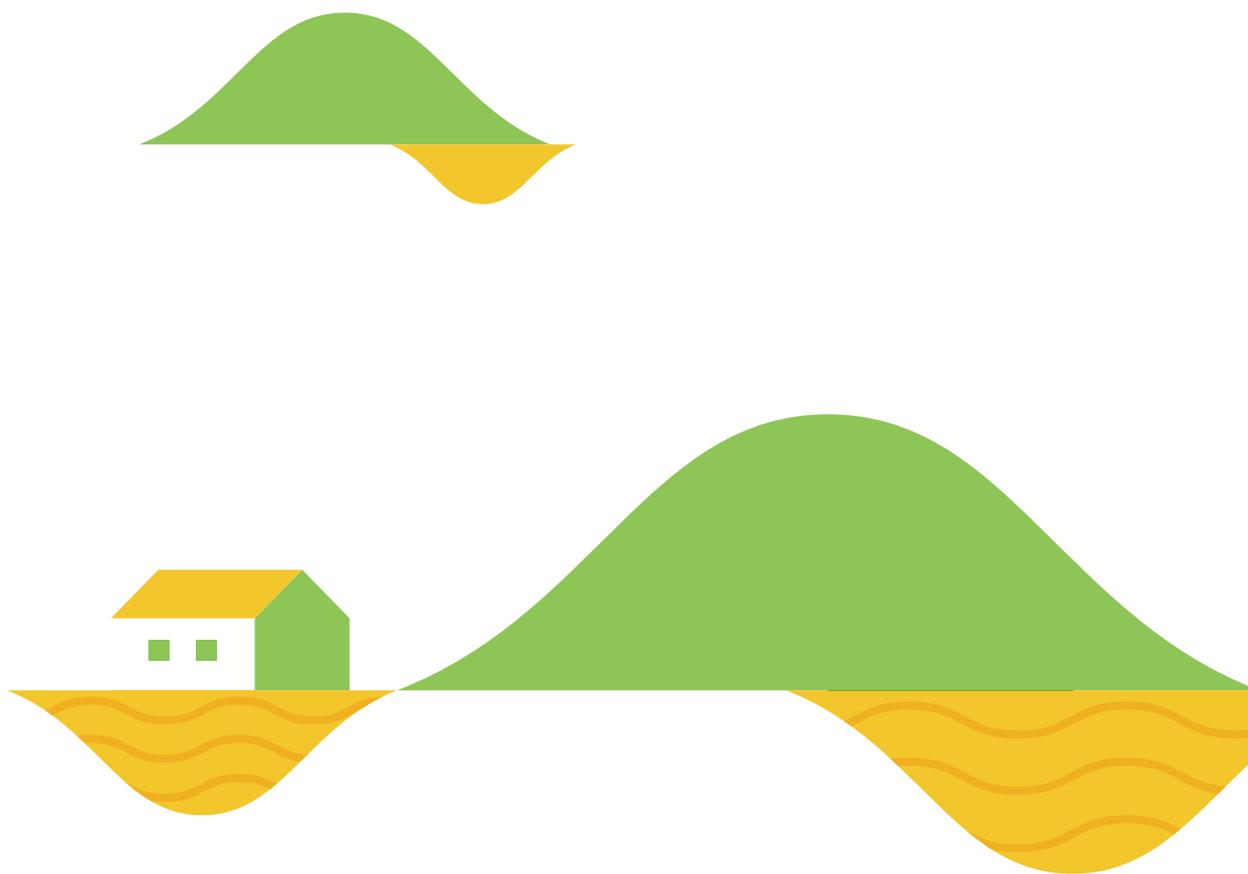
三一基金会自成立至今已有十载。基金会长期致力于推动“科学公益”,为我国探索更好的慈善理论。如今,公益事业发展迅速,中西思想并立,传统与现代交融,一时间信息纷繁,从业者也觉乱花迷眼。《通识》正是希望为身处其间不断求索的同伴提供支持。

然而《通识》虽涉及细分领域，但各领域历经沉淀，知识体系博大精深，一本资料难以涵盖。此外，各领域发展阶段、状况不尽相同，因此编写形式也有差异。《通识》作为新的尝试，必定有诸多不足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感谢各领域主编、编委、参与试读 / 研讨等反馈的人士。能够支持《通识》开发，是基金会的莫大荣幸。惟望《通识》能不断更新迭代，长久留存。因为《通识》不仅是对知识的综合，亦是对前人筚路蓝缕的历史记录。山林宝藏，留赠来者。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

2022年9月1日



主编



朱理

中级社会工作者，时任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乡村振兴业务负责人。

先后服务于青神县乡村妇女儿童发展促进会、香港乐施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多家公益机构，参与或组织实施过数十个公益项目，兼具项目资助方与执行方的双重视角与项目管理实战经验，服务村民，深耕乡村十余载，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助力。所服务的道童村，先后被评委全国老年友好示范型社区、敬老文明号等先进单位；三一基金会道童村项目案例，入选 2024 上市公司乡村振兴最佳实践案例名单。

致谢



本通识在开发过程中组织了试读及研讨，共收到超过 223 条反馈。参与试读及研讨的伙伴来自国际国内基金会、各类型注册社会组织、未注册社会组织、研究机构等多个类别，特别感谢以下伙伴在通识开发过程中的贡献。

编委（按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序）

陈晶晶、董文琪、华雪霁、吕松波、李佳琛、王欣、张勇

试读伙伴（按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序）

陈成才、陈灼棋、冬少洲、宫亚飞、胡月玲、黎宁、李涛涛、孔德峰、汪伟楠、王劼漪、邢颖茹、徐颖、杨世英、于海琴、余永刚、翟瑞、郑冬启、郑丽、张雨姗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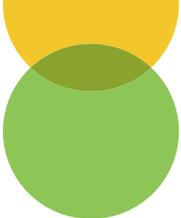
乡村是什么？乡村是晨曦中露珠闪烁的绿野，是夕阳下炊烟袅袅的屋舍，是月光里犬吠深巷的宁静，是星空中萤火微明的浪漫。它是农夫挥汗如雨的田野，是孩童追逐嬉戏的乐园，是老人倚门而望的安详，是游子梦回萦绕的乡愁。乡村是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的画卷，是历史与未来交织传承的篇章，是物质与精神双重富足的家园，是生命与梦想共同绽放的舞台。然而，随着近代中国的一声炮响，乡村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传统的农耕方式成为了落后的生产力，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逐渐解体，农民被认为是思想落后的社会阶层。乡村陷入发展困境。于是，乡村建设运动也伴随着社会运动逐渐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大量能人志士投入了智慧与精力。尽管乡村是一个梦想之地，乡村建设运动寄托着人们对乡村的遥远梦想、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执政者对乡村给予的深深厚望，但乡村发展依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亟待乡村振兴工作带来新力量。

乡村振兴是一个十分宏大的议题，复杂且系统。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乡村在自然风貌、文化习俗、资源禀赋等方面有着十分明显且具体的差异，乡村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振兴乡村的现实基础千差万别。乡村也是最能显见社会主要矛盾的地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乡村振兴的参与主体也非常广泛，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广大公益组织等均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这些力量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乡村也有着不同的需求或期许，因而对乡村振兴有着很不同的发展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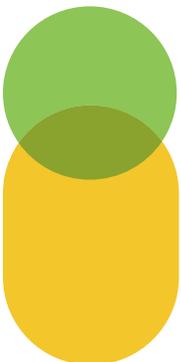
在乡村振兴这个复杂且宏大的议题里，很多专家学者做过非常多专业且系统的论述，涉及产业发展、乡村治理、集体经济、民俗文化、乡村环境、乡建历史、民间信仰等诸多方面。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企图通过一本薄薄的通识，为初入乡村的公益从业者或者对乡村发展感兴趣的青年们，带来一些基本的乡村知识，引发思考和启发，这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尝试。因此，我们选取了“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振兴”这一细微处作为切入点，对乡村振兴议题做部分呈现。本通识从乡村发展的一些基本概念入手，对乡村的发展历程、文化脉络、主要政策、发展模式做梳理汇编，并介绍乡村工作的一些理念与方法，希望能够为即将进入乡村开展公益项目的青年朋友们，提供借鉴和参考。并且，本通识还希望能够帮助公益组织从业者在初次进入乡村时，提前了解一些关于乡村振兴的基本知识，从而做一些心理或知识的储备，可以更加坦然地走进乡村，实践自己的公益梦想。但囿于篇幅等限制，本通识将重点放在整体的基本知识层面，不再对乡村振兴的各个板块，比如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等，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分享，或者对某些特定的案例、典型的村庄进行深度的分析。

当然，本通识并不是一本学术专著，更不是一本教科书。虽然通识尽可能地学习和参考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料，采纳融合各方专家学者的意见，客观地进行表述，但总结与思考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受限于主编的学识和能力，某些看法也难免局限于个人的视野及个人的乡村工作经历。所以本通识更多是一本参考书，抛砖引玉，希望可以有多人一起关注乡村和乡村振兴，直言不讳地阐述对乡村的认知，并与我们一起在乡村坚持践行公益使命。相信乡村会因为更多公益组织的到来，变得更有活力，会因为更多公益人士的关注，变得更有力量！希望本通识也因为更多青年学者的践行，变得更加鲜活而务实！

在此，特别感谢河海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夏多曼女士对本文整体结构提出的诸多富有洞见的建议，并对全文进行了细致的文字梳理与润色。同时，也衷心感谢我的同事李超群、李知行给予的持续支持与鼓励，以及三一基金会能力支持团队各位同仁的鞭策与推动，使本通识内容得以顺利完成。



目录



第一章	认识乡村及乡村振兴	01
	一、认识乡村和乡村振兴基本概念	01
	二、认识乡村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05
第二章	中国乡村发展的历程	7
	一、乡村土地制度的沿革	7
	二、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10
	三、系统性的脱贫攻坚计划	12
	四、乡村振兴战略	14
	五、公益组织推进的乡村发展实践	15
第三章	公益组织乡村常用工作手法	20
	一、乡村社会工作手法	20
	二、参与式乡村评估	22
	三、社区营造	25
	四、乡村行动研究	27
第四章	公益组织的公益项目	30
	一、规模化 VS 小而美	30
	二、大产业 VS 小生计	31
	三、兜底户 VS 贫困户	32
	四、乡村的成功 VS 失败	32
	五、公益组织如何做好乡村项目	33
第五章	乡村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35
第六章	乡村振兴典型村庄简介	41
第七章	乡村工作的未来可能	47
	 结语	50



第一章

认识乡村及乡村振兴

乡村，伴随着乡村振兴成为了社会上的热门词汇。公益组织进入乡村之前，应该对乡村及乡村振兴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认知。

一、认识乡村和乡村振兴基本概念

1. 乡村与农村

“乡村”和“农村”这两个词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经常交替使用，但是如果细致揣摩，还是会发现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异。

乡村是一个综合概念，是一个地理、经济、社会、文化、行政等多个维度交织在一起的概念集，主要特征包括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人口相对稀疏的居住格局、深厚的乡土文化和紧密的社区关系，以及与城市不同的行政与社会治理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简称《乡村振兴促进法》）中，明确约定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农村，是以农业为产业基础形成的乡村村落。农村更偏于一个产业概念，强调农业是乡村的主导核心产业，强调在乡村中居住的村民职业是农民。

从这两个概念的比较，可以看到“乡村”和“农村”虽有共通的地方，但“乡村”在产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上更加多元化。目前政策文件从前些年的“三农问题”到现在“乡村振兴”，从各种表述的变化可以发现，乡村的多元发展概念逐渐被大家所接纳。乡村的发展不局限于农业、农村、农民，可以依据乡村的自然禀赋、区位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寻找不同的乡村发展之道。

2. 振兴与复兴

“振兴”与“复兴”是我们在乡村发展工作中经常遇见的两个词。振兴，顾名思义就是使其发展壮大，繁荣兴盛的意思。“复”是再次的意思，复兴，就是再次繁荣兴盛。振兴强调在现实的基础上，向更加现代化、未来的方向发展，复兴是在历史荣光的基础上，重新恢复繁荣昌盛的面貌。我国有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史，建立过高度繁盛的农耕文化，无论是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道法自然的生产技术，还是各具特色的传统习俗，孝老敬亲的社会伦理，直到现在在乡村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曾经很多组织习惯使用“复兴”一词。复兴乡村承载了我们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推崇，符合国家传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振兴”成为了新的热门词汇。振兴乡村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议题之一，体现了国家对乡村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期望，乡村振兴战略旨在通过一系列综合措施，促进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3. 乡村振兴的实施主体

乡村振兴是一项重大的社会议题，乡村振兴的历史重任也是由诸多社会主体共同承担的。结合党和国家相关政策，从目前的乡村实践来看，乡村振兴最主要的实施主体有四个，分别为农民群体、各级党委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新乡贤和返乡人才。各方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农民群体，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当前实践中，村民是村庄发展最直接的知情者和参与者，但普遍存在资源匮乏、能力不足等现实困境，且常因主体地位弱化而陷入被动接受规划指导、单向接受外部教育的困境，这种主客体关系的失衡易导致乡村振兴实践与在地需求产生偏差。因此，在《乡村振兴促进法》中，明确约定“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公益组织在服务过程中，需要立足于具体村庄的差异化需求，通过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与村民形成深度互动，与村民一起直面困境。

拓展阅读：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党支部，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设立的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主要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村民委员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设立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主要负责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设立的特别法人，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包括乡镇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负责管理集体资产，开展经营活动（如土地发包、资源开发等），但不得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

各级党委政府，是乡村振兴具体工作的统筹者和主导者。据统计，我国 2023 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6.16%，在乡村仍然居住着约 4.7 亿人口，承载着 4.7 亿人口的乡村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责任，如何振兴乡村发展，是政府的职责，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承诺。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全面阶段性部署。2019 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相继出台系列配套政策文件，完善乡村振兴五年规划体系。国家和政府对乡村的重视可见一斑。为了确保乡村振兴工作顺利推进，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了“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并要求“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企业和社会组织，是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企业是开展乡村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在乡村发展中，企业可以通过引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推动农业产业升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增加村民收入；还可以帮助小农更好地对接市场，丰富销售渠道，提高本土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社会组织（含科研机构、公益组织等），常将乡村视为承载理想主义情怀的实践场域。乡村因其承载着青山绿水的生态愿景、扶危济困的人文温度或代际传承的文化根基，吸引大量公益力量持续扎根。《乡村振兴促进法》更以政策形式明确鼓励社会组织发挥专业优势，在乡村产业升级、技术帮扶等领域与政府形成互补协作。不过受限于自身的资源整合能力与在地经验，社会组织多聚焦于特定领域（如银龄关怀、生态保护、乡村教育等），其运作模式大多需依托村级党组织引导的多元共治框架，通过村民议事会等自治组织实现需求精准对接。

新乡贤和返乡人才，是乡村振兴实践中的重要补充。乡贤一词始于东汉，作为一项国家荣誉，用于表彰有作为的去世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乡贤文化随之诞生。新中国成立后，乡贤的内涵更加广泛，涵盖的人群更加多元，因而称

为“新乡贤”。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新乡贤大多具有专业的知识，成功的经验，又对家乡充满感情，能够为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其凭借资源、技术或经验优势，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关键力量。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专门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乡村振兴促进法》中也明确约定“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要求“为返乡入乡人员和各类人才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服务”。在政策层面鼓励新乡贤和返乡人才参与公共项目、投资兴业，增强乡村活力。

4. 总体目标和五大振兴

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目标涵盖了多个方面，旨在全面提升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质量。具体来说，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包括以下几个核心点：

产业兴旺：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特色产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生态宜居：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保护和修复农村生态，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乡风文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农村精神文明水平，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增强乡村文化软实力。

治理有效：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确保社会稳定和谐。

生活富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为了总目标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还制定了“三步走”的时间表：即到2022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健全，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为了实现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实现全面发展，国家提出了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振兴策略。

二、认识乡村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乡村区域禀赋、文化习俗迥异，导致中国乡村的发展现状多元且复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了历史性的巨变，中国乡村也正在经历着深刻而长远的转型。

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动着乡村基础设施改善，特色产业兴起与数字化治理加速，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传统文化与生态价值逐步被重新认知。另一方面，乡村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人口持续外流导致的空心化与老龄化（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占比超60%），土地制度与产权改革滞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且抗风险能力弱，生态环境治理压力加剧（面源污染、资源过度开发），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显著，教育医疗资源短缺，基层治理内生动力不足，传统宗族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亦在部分地区引发社会整合难题。这些挑战是乡村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亟待通过制度创新与多元主体协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阵痛，本质上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价值体系的碰撞。比如在中国悠久历史的传统农耕文化中，千年传承的种养循环体系——牲畜粪便还田、秸秆焚烧增肥等低碳农耕智慧，正被现代治理标准重构为“污染源”。这种以城市中心主义建构的环保范式，忽视了中国传统农业“取之于土、归之于田”的生态闭环逻辑。当居住区与养殖区强制分离割裂物质循环链，当禁烧令打破耕地微生态平衡，乡村被迫承受着“去农化”改造带来的文化断裂带。

作为公益从业者，需穿透政策表象触及结构性矛盾：城乡二元体制下，乡村既要维系农耕文明基因，又需适配工业化治理框架，这种撕裂实为发展权失衡的缩影。唯有建立“双向赋能”认知框架——既承认现代农业技术迭代的必要性，也珍视乡土知识体系的价值，才能在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间架设真正平等的对话桥梁。站在乡村和村民的立场上，来思考乡村的巨变和问题，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拓展阅读：2024年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状况

2024年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呈现全面向好态势，粮食安全基础进一步夯实，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乡村振兴取得新突破。全年粮食总产量达1.4万亿斤，同比增长1.6%，首次达到该数值，其中夏粮产量2997.8亿斤、秋粮10568.7亿斤，三大主粮（小麦、玉米、稻谷）均实现增产。大豆产量2065万吨，油料自给率提升，猪牛羊禽肉产量达9663万吨，较上一年增加0.2%，水产品产量7366万吨，增加3.5%，农产品供给能力稳步增强。

农民收入方面，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实际增长6.3%，城乡居民收入比

缩小至 2.34:1，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 3300 万人，务工质量显著提高。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粮食单产达 394.7 公斤 / 亩，单产贡献率超 80%，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 9400 万小农户，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全面实施，种质资源保护新增 13.9 万份。

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超 60% 监测对象消除返贫风险，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速领跑全国。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13 万公里，快递覆盖率达 95%，自来水普及率 94%。生态治理成效突出，化肥、农药使用量分别减少 10% 和 15%，耕地面积增至 19.29 亿亩，新增耕地 1758 万亩。中央财政农业农村支出达 2.5 万亿元，增加 10%，金融支持力度同步加大，农村贷款余额突破 20 万亿元，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第二章 中国乡村发展的历程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农耕历史文化的国度。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乡村的发展史。朝代的更替，历史的轮回，主要是在调整内部农民耕地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关系。了解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找到乡村振兴的基础。

一、乡村土地制度的沿革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重要内容。在乡村，土地是最重要的发展要素，土地制度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

1. 从公有到私有

原始社会时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需要通过集体劳动来共同狩猎、采集食物以维持生存，土地属于公共资源，为部落所共有，服务整个族群的发展。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农业革命的发生，人类开始定居下来，逐渐出现了私有财产的概念，但土地仍然主要是部落共有。

到了封建社会，商朝开始实行井田制，其特点是按照“井”字形把土地划分为九个方格，中间的一块为公田，周围的八块为私田。每个方格称为“一井”。农民集体耕作公田，所得归贵族或国家；私田则由个人耕种，收益自享。

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提高，原有的井田制逐渐无法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变化。加上战争频发、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土地所有权开始向私人集中，最终导致了井田制的瓦解。各国纷纷推行变法，如秦国商鞅变法中就包括了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制，并鼓励开垦荒地等措施。

秦朝统一后，进一步强化了土地私有化趋势。汉代初期曾通过实施屯田制（即政府直

接经营农业)来解决边疆地区的粮食供应问题,但总体上还是延续了土地私有的基本格局。

东汉末年开,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地所有权更加分散,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现象,北魏曾采取均田制的方式,按人口分配土地以抑制兼并,但后来因官员腐败、高利贷严苛导致破产。豪强地主掌握了大量土地资源,导致小农经济日益脆弱。隋唐时期曾经尝试采取均田制(即按照人口数量来分配土地),试图通过分配给农民一定数量的土地来缓解社会矛盾,但实际上执行效果有限。到了中晚唐时期,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现象已经相当普遍,许多贵族和富商拥有大量私田,使得原有均田制难以维持,均田制彻底崩溃。

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租佃关系成为主流的土地使用方式之一。大地主拥有土地并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户耕种,后者需向地主缴纳租金。明清两代继续沿用了这种模式,但由于人口增长迅速而可耕面积相对固定,人地矛盾愈发突出,加之赋税负担沉重等因素,农民生活状况恶化,乡村发展也面临困境。特别是清末民初,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农村经济、乡村社会遭受严重破坏。尽管有一些改良派人士提出改革建议,试图改变不公平的土地分配现状,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难得到实施。

2. 从私有到公有

清朝末年,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个阶层的仁人志士均在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方案。比如太平天国运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废除了土地的封建地主所有制,按照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先生提出“平均地权”,是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重要主张,通过调节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相应的土地权益,特别是让耕者有其田,以此来缓解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但这些方案均未得到落实发展,中国仍保持原来土地所有制,直至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期间(1924-1927年),共产党尝试通过减租减息来改善农民状况,但随着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而中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共产党在苏区进行的土地革命,推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个体所有制。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暂时放宽了对地主阶级的打击力度,采取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初期(1946-1952年),全面展开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次的土地革命,使土地由地主私有制转变为农民私有制,确立了农民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改变了土地所有制结构,重新分配了土地,调整了农村社会经济关系,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50年代初期至中期，在土地革命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对农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农业合作化”或“农业集体化”，目的是将小规模、分散的个体农户经济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最终发展为人民公社体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初级阶段（1949-1953年），组建互助组。这是农业合作化的初级形式，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互助小组，共同劳动，共享资源。这个阶段主要强调的是劳动上的互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仍然属于个人。（二）中级阶段（1954-1955年上半年），组建初级社。随着互助组的发展，进一步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个阶段，农民开始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合作社统一经营，但分红时仍考虑土地份额。这种合作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三）高级阶段（1955年下半年-1956年底），组织高级社。到了1955年下半年，随着政策的推进，许多初级社被合并升级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高级社中，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完全归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不再按土地分红。这标志着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土地由农民私有转变为国家公有和集体所有。

拓展阅读：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初是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这本来是出于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却演变成一场不顾客观条件、争相推动农业集体生产组织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的普遍的群众性运动。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正式决定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并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这个《决议》下达后，把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建立不到两年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多数被人民公社所代替，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合一的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基本上是一乡一社，甚至数乡一社。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在人民公社内部，从生产资料所有、分配制度、交换关系乃至社员的生活资料都强调一个“公”字。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大刮“共产风”的过程。这些所谓不断增加“公有”成分的错误做法，完全违反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原则。其结果不仅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

3. 现代新型土地制度

1978年夏季，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遭遇严重旱灾，农民生活极度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决定冒险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模式，即土地分给农户耕种，自负盈亏。这一做法打破了当时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劳动和分配方式，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随后小岗村的经验，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等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先后在全国各地展开尝试。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第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正式认可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随后几年里，中央连续发布多个一号文件，进一步推动和完善这一制度，使之成为全国普遍实行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是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由农户承包经营，自主管理，自负盈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农户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此后的政策调整中，进一步明确了延长承包期至三十年不变的原则，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及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增加，政府鼓励土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加强耕地保护力度，实施严格的耕地红线政策。此外还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等方面的政策措施。2007年颁布了《物权法》，明确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的地位。2013年以来，提出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改革思路，旨在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农业效率。2016年，《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发布，进一步明确了“三权分置”的具体措施。

2018年，为了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中国继续探索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包括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同时，加强对耕地保护，防止过度开发和非农化利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并推动解决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以确保农民能够共享土地增值的收益。

二、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军阀混战，生产力低下，处于国家和人民积贫积弱的时期。一些学者回国，政治上没有干预的空间，转而从社会上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于是以农村为工作对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

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1926年起，晏阳初带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在河北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开展了乡村教育实验。

梁漱溟认为，民国以来“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就非靠多数人具有新政治习惯不可”。而新政治习惯的培养，“天然须从乡村小范围去作”。梁漱溟带领团队在山东邹平开展了一场以乡村新政为主题的乡村建设运动。具体措施是建立以“乡农学校”为核心的“行政教育合一”的乡村基层组织，普遍推行“新乡约”。在经济上，尝试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结构，实行“合作经济”，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梁漱溟试图从社会的最基层入手，建立一个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收西方文化长处的新的社会组织，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院务组织有教务处、庶农处、图书馆、乡村书店、招待所、农场、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庄仓合作社、卫生院、凿井队等。

卢作孚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工业化，而交通是工业化的基础。因此，他首先创办了民生公司，以低成本的轮船运输业为起点，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后续的乡村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区进行综合性乡村建设实验，认为乡村建设不是单一领域的改革，而是涉及农业改良、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他设置了气象台，建立了农事试验场和苗圃，改良副业，加强技术指导，并改良农作物品种，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卢作孚还注重社会体系的重建和公共道德的建设，通过建立市民代表大会等机构，推动政务公开，鼓励民众参与地方管理，培养民众的自治能力，实现了较为广泛的民主参与和社会治理创新。深知人才对于乡村现代化的重要性，卢作孚重视教育普及和人才培养，倡导“懂农村、爱农民、爱农业”的三农队伍建设，强调人的现代化是乡村现代化的前提。整体而言，卢作孚建设思想的一个最核心层面，即他所提出的“训练人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的命题与任务。他提出“人人都能自立，人人都能立人”作为乡村建设的根本目标。

除上述民国“乡村建设三杰”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乡村建设实践和运动。总体而言，20世纪30-4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并对今日农村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今天仍有学者以当年的经验做法为基础，继续开展新乡村建设运动，为现代“三农”问题探索解决方案。

三、系统性的脱贫攻坚计划

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乡村发展系统规划，全社会动员，投入大量物力人力，其主要政策计划有两项：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脱贫攻坚计划。

1.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是中国政府为解决农村地区深度贫困问题而制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该计划正式启动于 1994 年，其名称来源于计划的目标：用 7 年时间（即到 2000 年），通过 8 个方面的措施，解决中国当时 8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实现基本脱贫。

这 8 个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修建道路、桥梁、水利设施等，改善贫困地区的发展条件。（2）发展农业生产：通过推广农业技术、调整种植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来增加农民收入。（3）易地搬迁扶贫：将生活在自然条件极端恶劣、不具备基本生存和发展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至更适宜居住和发展的区域。（4）劳动力转移培训：对贫困人口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其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5）科技扶贫：利用科技手段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引进适合贫困地区的科学技术和项目。（6）社会事业发展：改善贫困地区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条件，提高人口素质。（7）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在扶贫开发中注重生态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8）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通过改革激活农村经济，利用外资和技术支持扶贫。

该计划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开始大规模、系统化推进反贫困工作。到 2000 年底，该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大量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这一计划为后续的扶贫开发工作奠定了基础，并逐步演化为中国全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 2020 年底，中国宣布消除了绝对贫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

2. 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方略

脱贫攻坚计划是中国政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实施的又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旨在彻底解决农村地区的极端贫困问题。这项工作的目标是，到 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为此，该计划主要举措有：（1）精准扶贫：通过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确保扶贫资源准确到达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和个人。（2）产业扶贫：发展符合当地实际的特色产业，如种植业、养殖业、乡村旅游等，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3）易地搬迁：对于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同时配套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确保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4）教育扶贫：通过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资源，提供助学金、奖学金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5）健康扶贫：提高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减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6）社会保障兜底：为丧失劳动能力、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贫困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自 2012 年起，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成为中国治国理政的优先任务之一。经过数年努力，到 2020 年底，中国宣布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任务，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拓展阅读：脱贫攻坚历程及意义

2015 年 1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11 月 27 日至 28 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11 月 29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2019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布的 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10 月，国家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成立。

2020 年 7 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开展 2020 年脱贫攻坚督查工作。11 月 23 日，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出列，至此，中国 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2021 年 2 月 21 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出炉，主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2 月 25 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3 月 9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函习近平祝贺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4 月 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中国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历史性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70%。

脱贫攻坚战对中国农村的改变是历史性的、全方位的，是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深刻改变了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整体发展。

四、乡村振兴战略

脱贫攻坚主要针对现行标准中贫困线以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民生问题，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但农村低收入人口仍然较多，城乡发展仍然差距较大，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仍需时间。2017年10月，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是中国乡村发展战略的重要转移，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跃升，本质上是解决绝对贫困后向多维发展转型的系统性制度创新。

为此，通过接续机制、接续投入和接续产业，以五年为过渡期，要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旨在强化政策的连贯性，持续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以及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产业升级，以确保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既延续脱贫攻坚的精准施策优势，又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能。这种战略调整深刻回应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即从回应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生存保障到发展需求，这种战略跃迁通过重塑城乡关系、创新要素配置、升级治理模式，不仅夯实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根基，更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乡村变革道路。

乡村振兴政策演进时间表

时间	文件 / 政策名称	核心内容	政策意义
2018.0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首次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等发展目标。	标志着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为解决城乡发展失衡提供制度框架。
2018.09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制定五年行动纲领，划分乡村振兴“三步走”阶段，部署农业现代化、生态保护等重点任务。	首次以专项规划形式明确乡村振兴实施路径，推动“三农”工作系统性变革。
2021.0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提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明确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强调粮食安全底线。	21世纪第18个中央一号文件，标志“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振兴。
2021.02	国家乡村振兴局挂牌	国务院直属机构正式成立，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实现脱贫攻坚机构向乡村振兴机构的职能转换，强化组织保障。

时间	文件 / 政策名称	核心内容	政策意义
2021.03	《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	建立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制，推进产业帮扶、就业扶持等衔接政策。	构建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机制，防止规模性返贫。
2021.04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立法明确各级政府职责，确立城乡融合、人才支撑等制度保障，规范乡村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	首部乡村振兴领域基础性法律，实现政策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跨越。
2024.0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强调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提出乡村建设“有力、有效”新要求。	推动乡村振兴从“全面推开”转向“提质增效”，强化示范引领与实践创新。

五、公益组织推进的乡村发展实践

不同类型的公益组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乡村发展均有不同程度的实践。这里我们不能详细拆解，只从整体上简要概述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内公益组织在乡村发展层面的实践历程及带来的社会影响。

1.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内的乡村实践

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以下简称 INGOs）在中国乡村的实践历程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早期，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加深而不断演变。以下是 INGOs 在中国乡村中开展活动的大致历程和特点：

（1）起步与探索阶段（1978 年改革开放至 1990 年代末）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一些 INGOs 开始进入中国开展项目。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小规模的项目来测试和展示工作模式，主要集中在灾害救援、扶贫开发和医疗卫生等领域。这一阶段的活动较为有限，且面临诸多法规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INGOs 的活动多依赖于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与许可。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内地的著名 INGOs 有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香港乐施会（Oxfam Hong Kong）、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无国界医生（MS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国际小母牛组织（Heifer International）等。

(2) 快速发展阶段（2000 年代至 2010 年代）

2000 年后，随着中国加入 WTO 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对国际合作的支持增加，INGOs 的数量和他们所执行项目的规模都有显著增长。它们开始参与到更多样化的领域，在国内乡村的活动显著增加，涵盖教育、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文化保护、灾害救援、社区发展等多个领域。2004 年左右，中国开始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 INGOs 的运作，标志着监管体系的逐步完善。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INGOs 加强了与本地伙伴的合作。一些国际知名 INGOs，如国际红十字会、世界宣明会等，加快了在中国合法注册的步伐，进一步参与到乡村发展中，以提高乡村项目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3) 调整规范化阶段（2010 年代至今）

在这一阶段，2017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明确了 INGOs 在华开展活动需完成法定登记程序并确定业务主管单位的管理框架。在此规范体系下，部分 INGOs 通过调整业务布局应对政策环境变化，包括精简在华项目规模或暂停特定领域活动；另一些组织则着力加强与政府部门、在地合作伙伴的协同合作机制，强化法律合规性审查。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政策导向演进，该类组织在气候变化治理、社会公平促进及乡村可持续发展等新兴议题领域的投入显著增加，其项目运作模式更强调社区赋权、本土资源整合及长期效益延续等策略。

整体来看，即使经历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面临着风云变化的国际环境，INGOs 仍是推动中国乡村发展重要的一股力量。它们曾为中国乡村带来了先进的发展理念、技术、方法、大量的项目资金，培育了国内首批 NGO 组织，促进了当地社区能力的提升，不仅为解决中国乡村面临的各种问题贡献了力量，其相对完善的项目管理机制、缜密的项目逻辑，对于中国自身的公益组织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随着中国自身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壮大，INGOs 也在寻找新的合作方式，以实现共同的目标。

部分在国内乡村发展领域开展项目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列表

组织名称 (中文)	组织名称 (英文)	组织属性	在华活动时间	代表性工作项目 / 案例
世界自然基金会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	NGO	1980 年至今	大熊猫保护、长江流域生态修复、森林可持续管理
绿色和平	Greenpeace	NGO	1997 年至今	气候变化倡导、可再生能源推广、电子垃圾污染调查
保护国际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CI)	NGO	2000 年代初期至今	云南和四川生态系统保护、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
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	NGO	长期合作 (如 2008 年汶川地震至今)	灾害救援 (汶川地震、新冠疫情)、公共卫生支持
无国界医生组织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	NGO	1990 年代至今	偏远地区艾滋病治疗、突发疫情医疗援助 (如疟疾、结核病防治)
盖茨基金会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NPO	2007 年至今	艾滋病防治、结核病控制、农业扶贫 (如水稻新品种推广)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NPO (联合国机构)	1979 年至今	儿童营养改善、教育公平项目 (如农村学校建设)、灾害应急响应
乐施会	Oxfam	NGO	1980 年代至 2021 年	云南和贵州扶贫、性别平等、灾害风险管理 (如汶川地震救援)
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	NPO	1988 年至今	教育公平、法治建设、社会组织能力提升 (如资助法律援助项目)
国际助残	Handicap International	NGO	1990 年代至今	残疾人康复服务、权益保障合作 (与中国残联联合项目)
世界资源研究所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NGO	2010 年左右至今	低碳城市试点、可持续交通规划研究 (如北京、深圳政策支持)

2. 国内公益组织的乡村实践

国内公益组织在乡村的实践历程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非营利部门逐渐兴起，公益组织也随之诞生。这些组织通过各种项目和服务，致力于解决农村地区的贫困、教育、健康、环境等问题。

(1) 初步探索与起步阶段（1980 年代初期至 1990 年代末）

这一时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城乡差距加大等问题，加之国际非政府之间合作加深，一批早期公益组织应运而生。早期公益组织多为政府支持下的半官方机构，它们主要进行小规模试点项目，如扶贫、教育支持等。比较典型的有：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原中国扶贫基金会，1989 年成立），是中国最早的专注于农村发展的非营利组织之一，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减贫、乡村教育、乡村健康等多个领域的工作；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89 年成立），发起“希望工程”，帮助贫困地区建设学校和资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2) 快速发展和多样化阶段（2000 年代中期至 2010 年代）

这一时期，国家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力度加大，以及国际经验的引入，国内公益组织的数量和影响力显著增加，活动内容和形式趋于多样化，开始涉足更多领域，包括环境保护、社区发展、妇女赋权、文化保护、老年人关怀等多个领域，并且更加注重项目的可持续性和参与式方法。特别是 2008 年汶川地震，大大激发了公众的慈善意识和参与热情，推动了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制度化、专业化发展。比较典型的有：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2002 年成立），专注于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农业，推动绿色生活方式；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2007 年成立），通过创新的社会企业模式，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方案；自然之友（1994 年成立），开始在乡村推动生态农业、水源保护等项目，关注乡村环境问题。

(3) 规范化与融合阶段（2010 年代末至今）

自 2015 年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以来，公益组织在乡村实践中的角色更加突出，深度参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众多公益组织开始探索与政府、企业、高校及国际组织合作的新模式，如通过 PPP（公私合作）、社会企业等方式，推动乡村经济、教育、健康、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使公益组织更加注重乡村的内生动力激发，通过能力建设、人才培养、社区动员等手段，帮助乡村探索自我发展。

“互联网+公益”持续创新，如通过众筹、直播带货等形式，帮助乡村产品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也推动了公益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比较典型的有：壹基金（2007 年成立，2011 年正式注册），由李连杰创办，广泛参与灾害救援和乡村儿童关怀等领域的工作；腾

讯公益慈善基金会（2007年）、阿里巴巴基金会（2011年成立），充分利用其电商平台和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势，帮助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

整体而言，国内公益组织在乡村实践中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快速发展的过程，目前正朝着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前进。项目由简单的慈善捐赠到为乡村提供综合服务发展，从短期援助到关注乡村可持续转型，从单向供给向多方合作共建共治转变，展现了国内公益组织顺应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国内公益组织在自身进步的同时，不仅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构建和谐社会特别是和谐乡村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章

公益组织乡村常用工作手法

乡村是一个复杂的工作场域，因其社区本身的独特性而独具挑战。公益组织在乡村开展工作，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合理工作方法，了解村庄和村民的需求，以精心设计项目，并确保其有效实施，从而达成预期目标。在乡村工作中，常见的设计项目的系统性工作手法有以下几类：

一、乡村社会工作手法

乡村社工是指在农村地区从事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士，他们致力于解决农村社区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回应乡村的服务需求，通过直接提供服务、支持和倡导，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促进社区的整体发展。乡村社工的角色非常多样，他们的工作可能涵盖教育、健康、福利服务、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乡村社会工作也是社会工作中的重要分支之一。

1. 乡村社工的主要工作内容

1.1 需求评估：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村民的具体需要；分析乡村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基于需求，科学设计项目活动。

1.2 资源整合与链接：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如引入政府资金、社会组织支持、企业赞助等，协助申请各种福利项目和社会援助；同时发掘和利用本土资源，如传统知识、乡土人才、自然环境等，为社区发展提供物质和智力支持。

1.3 社区发展：通过召开村民大会、组建村民自治组织、开展公共事务讨论等方式，增强村民对村内事务的参与度，鼓励村民参与到乡村发展事务决策中，提高村民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建立或加强乡村组织（如合作社、协会等）；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学校、卫生站等。

1.4 教育与培训：开展健康教育、法律知识普及等活动；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就业竞争力。

1.5 心理支持与咨询：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留守问题、外出务工人员家庭分离等社会心理问题，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服务，提升村民的心理韧性。

1.6 政策倡导：乡村社工需要了解并向村民解释国家的农业、教育、健康等领域的政策，同时也要代表村民利益向上级政府或相关部门反馈问题，推动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制定；通过媒体和公共活动提高对特定问题的关注度。

1.7 环境保护：通过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净村活动等，推广环保意识，开展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活动；参与自然资源保护项目，如植树造林、水资源管理等。

1.8 文化遗产与发展：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是乡村社工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记录口述历史、恢复民俗活动、推广乡土教育等手段，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同时吸引外界关注和支持，保护和传承当地的文化遗产；通过文化艺术活动增强社区凝聚力。

2. 乡村社工的主要工作方法

2.1 小组工作：在乡村社会工作中，小组工作是一种有效手法，它能够促进村民间的互助合作，增强社区凝聚力。小组可以围绕共同的兴趣或问题建立，如农业技术交流小组、妇女自助小组、青少年成长小组等，通过活动增进知识、技能分享和情感支持。

2.2 个案管理：由于农村社区以家庭（特别是农户）为基本单位，社工需要深入了解农户的结构、功能以及面临的经济、社会和心理问题，通过个案工作方法提供个性化支持，比如帮助农户解决生产困难、家庭矛盾、心理健康等问题。

2.3 社区动员：通过召开村民大会、组建村民自治组织、开展公共事务讨论等方式，增强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度，使他们成为村庄发展决策过程的一部分。这有助于提高村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乡村社会工作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领域，乡村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帮助解决个体的问题，还需要促进整个乡村的发展和进步，它要求社会工作者具备高度的专业素养、良好的沟通技巧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及高度的文化敏感性。乡村社工更加关注乡村社会问题的回应和解决，工作方法与工作内容高度匹配，直接提供服务或链接外部资源，是目前解决乡村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扩展阅读：民政部“三区”社会工作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三区”计划，全称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计划，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

该计划于2012年正式启动，并在2013年开展首批选派与培养工作。其核心目标是为“三区”输送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提升当地社会工作服务水平，满足特殊困难群体的心理社会服务需求，推动当地社会工作专业化、制度化发展。

在实施方面，中央财政给予经费支持，每人每年补助2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差旅、保险及培训等费用。地方如云南省福利彩票公益金还会配套2万元，用于培训与行政经费等。各地选派的社工深入“三区”，围绕低保对象、低收入群体等特殊困难群众开展服务。

二、参与式乡村评估

参与式乡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简称PRA）是一种发展工作方法，强调以当地村民的积极参与为核心，通过一系列工具和技术来收集、分析和解释关于乡村社区的信息，以便更好地理解社区的需求、资源、问题和潜力。这种方法旨在打破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发展干预模式，转而支持一种更为包容、互动和基于乡村自身视角的发展策略。PRA的核心理念是强调在思想行为和态度上，要求外部发展工作者具备开放、尊重和合作的心态，愿意倾听和学习来自乡村社区的声音。

1. 参与式乡村评估的主要特点

乡村主导：鼓励村民主动参与到整个评估过程中，确保他们的意见和需求得到充分表达。

互动学习：通过小组讨论、游戏和其他互动活动，促进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学习。

可视化工具：使用图表、地图、时间线等直观的工具，帮助非文字记录者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多元视角：考虑到不同群体（如妇女、老人、年轻人等）的观点，确保评估结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即时反馈：在评估过程中及时分享发现，使参与者能够看到他们的贡献如何影响最终的结果。

透明度：保持整个过程的公开透明，增加社区对评估结果的信任度。

2. 常用的参与式评估工具

村庄资源图：绘制村庄布局图，标识出重要地点和服务设施，有助于识别基础设施不足之处。

农事季节历：记录一年中不同时间段内的农事活动、节日庆典等，了解乡村的时间分配模式。

活动范围图：记录不同群体的活动范围，互动对象以及频次，了解乡村的社会资本情况。

社区会议：通过组织社区成员（尤其是边缘化群体）进行开放式、平等化的集体讨论，激发本土知识共享与共同决策的过程。

劳动分工表：记录村内男女活动的类型和分工，了解性别情况。

问题树 / 目标树：分析村庄面临的问题及其根源，并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可以用来设定发展目标。

富裕程度排序：将村民按照经济状况分类，以识别贫困程度不同的家庭。

优先级排序：通过投票或讨论确定村庄最关心的问题或希望实现的目标。

历史线：回顾村庄的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帮助理解现状背后的原因。

SWOT 分析：分析村庄的优势 (Strengths)、劣势 (Weaknesses)、机会 (Opportunities) 和威胁 (Threats)。

乡村生计框架：又称为可持续生计分析矩阵，核心是通过“资产 - 策略 - 成果”循环与“脆弱性 - 抗逆力”视角，分析个体 / 社区如何利用资源维持生计并推动转型。其关键围绕自然、人力、社会、物质、金融五大生计资本展开诊断，旨在精准识别发展瓶颈，兼顾经济收益、社会公平与生态可持续，最终实现社区生计的韧性与内生性提升。

种类	名称	使用目标
信息收集工具	村庄资源图、活动范围图、每日行事表、农事季节历、社区会议、半结构访谈、劳动分工表、富裕程度排序、历史线等	高效准确地收集村庄信息，掌握村庄实际情况；与村民建立联系，取得信任。
分析工具	问题树 / 目标树、SWOT 分析、乡村生计框架等	共同分析，找到根本问题或核心需求。
决策工具	优先级排序、无记名投票等	达成共识，形成决策。

参与式乡村评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本地文化和地方性经验，关注弱势人群的参与性，鼓励发展工作者直接从村民中获得第一手信息，减少偏差和误解；在调研及决策过程中，通过可视化的工具和因地制宜的工具，让村民充分参与，提高其对村庄项目的支持度和责任感。所以 PRA 可以帮助公益组织更有效地识别和解决农村社区的实际问题，同时也为推动社区的长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PRA 方法在国际发展领域已被广泛应用于农村发展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农业发展、健康教育、灾害风险管理等多个方面，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

拓展阅读：陕西省丹凤县农村妇女健康项目

丹凤县农村妇女健康项目是由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组织实施的公益项目。项目以妇女健康为切入点，以参与式发展、社会性别和赋权理论为项目设计的科学理论基础，应用了农村参与式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以下简称“PRA”）科学方法和其他参与式实用性工具促进女性参与和赋能，构建了以妇女赋权为核心的健康治理模式。项目在 1997 年启动，时至今日，当年启动的社区发展基金仍在一些村庄继续运作并发挥着社区影响力。

在社区动员与需求挖掘上，项目采用社区会议和农事季节历的方法，组织妇女讨论健康痛点（如筛查认知不足、就医成本高），结合半结构访谈收集妇女对筛查流程的建议，识别出“服务可及性低”、“费用负担重”两大核心问题。

在参与式决策与服务设计上，项目联合妇联、医疗机构与村民代表成立协作组，通过脆弱性评估矩阵分析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推动“筛查免费化”“合疗报销提升 10%”等政策优化；利用村庄资源图标注医疗资源盲区，增设镇卫生院筛查点并开通上门服务。

在动态监测与迭代优化，项目建立健康追踪档案，结合季节性风险日历跟踪妇女健康行为变化，发现筛查后随访率低的问题后，通过参与式总结计划会邀请妇女提出“村医-妇女组长”结对随访机制，实现异常病例 100% 跟踪。

在内生动力培育与可持续发展上，项目设立社区发展基金（村民自筹+政府配套），支持妇女健康互助小组开展知识讲座与耗材补给；将 PRA 方法纳入基层卫生培训，培养“妇女健康委员”主导日常宣教，形成“自查-筛查-治疗-随访”全链条自治模式。

项目实施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两癌筛查覆盖率从 45% 提升至 89%，宫颈癌早诊率达 92%，乳腺癌早诊率超 75%；妇女健康知识知晓率从 58% 升至 91%，社区基金持续运营率达 80%。项目模式被陕西省复制推广，成为政府主导+社区赋能“公共卫生服务的典型案例。

三、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Community Building / Community Development) 指居民、公益组织、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 通过各种活动、计划和项目来改善社区环境、增进邻里关系、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并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其核心在于“自下而上”的参与, 强调居民的主体地位, 鼓励居民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愿景来规划和实施社区改变。社区营造的活动可能包括公共空间改造、文化活动举办、环境美化、历史保护、社区教育和经济发展项目等。

1. 社区营造的核心概念

参与性: 鼓励所有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决策和发展过程中。

合作与伙伴关系: 建立多方合作机制, 包括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以及社区内部的不同群体。

可持续发展: 确保社区项目服务具有可行性和持续性。

文化敏感性: 尊重和利用当地文化资源, 增强社区认同感。

自下而上: 从社区实际需求出发, 而不是由外部力量单方面决定。

2. 社区营造的方法和技术

社区诊断: 通过调查问卷、访谈等方式了解社区现状和居民的需求; 识别社区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SWOT 分析)。

参与式规划: 组织社区会议或工作坊, 让居民共同讨论社区发展目标和优先事项; 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 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表。

能力建设: 提供培训课程, 如领导力培训、项目管理等, 以提高社区成员的能力; 支持社区组织的发展, 如成立居民委员会、志愿者团队等。

资源整合: 寻找并整合来自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不同渠道的资金和物资支持; 建立资源共享平台, 促进社区内外资源的有效配置。

公共空间设计: 重新规划和设计公共空间, 使其更加友好和多功能, 如公园、广场、社区中心等; 鼓励居民参与到公共空间的设计和维护中。

社区活动：举办各种社区活动，如文化节、运动会、健康讲座等，增加居民之间的互动；通过活动加强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

志愿服务：发展社区志愿者队伍，鼓励居民为社区提供服务；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培养社区精神和互助意识。

政策倡导：代表社区利益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争取更多政策支持；参与地方治理，推动有利于社区发展的政策制定。

评估与反馈：定期对社区项目进行评估，收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评估结果调整计划，确保项目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社区营造是乡村工作的重要手段，旨在通过促进居民的参与和合作，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社会资本，从而推动社区的整体发展。社区营造不仅关注物质环境的改善，更注重社会关系的构建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社区营造注重社区意见领袖的培育，关注社区的能力提升，从人、文、地、产、景等多个方面剖析社区，找到营造的干预点。目前在台湾、日本等地均有实践成功的案例，值得乡村工作借鉴和学习。

拓展阅读：台湾省桃米村

桃米村，地处台湾省南投县埔里镇，距台中的直线距离约33公里。在1999年921大地震前，桃米村是一个传统农业村，以种植地瓜、稻田和麻竹笋为主，农民收入微薄。地震使其遭受重创，加之原本交通闭塞、资源匮乏，瞬间沦为埔里镇最贫穷的村子，农村产业没落、人口外流、垃圾填埋等问题突出。

面对困境，桃米村开启了转型之路。震后，当地发现自身虽在人文、历史、风景方面并无突出优势，却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多达23种台湾原生物种青蛙在此栖息，占台湾原生青蛙种类的72%，还有众多蜻蜓和鸟类。桃米村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在修复生态环境基础上，打造全台首个青蛙主题生态观光乡村。

桃米村重建的第一步是护溪行动，治理臭气熏天、污染严重的桃米溪，修复200多个池塘湿地，开发系列湿地公园景点。聚纸教堂成为体现社区精神和生态文明信仰的公共空间，独特建筑材质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村里将青蛙拟人化，在建筑和景观节点设置小雕塑展示23种青蛙，增加趣味性与知识性；还创造“祈福蛙”形象，赋予青蛙为灾难祈福的精神职能。

在产业发展上，桃米村强化运营服务，建设多间风格各异的民宿，每家民宿都提供村子生态导览服务，与村里景点构成闭环吸客系统。同时，开发草湳湿地等游乐休闲设施，建设绿植环绕的轻食区，售卖青蛙主题小商品。此外，桃米村通过NGO组织邀请大学教

授团队授课，拓展村民对后现代经济可能性的认知。2014年，以桃米为原型的3D立体动画电影《桃蛙源记》上映，推动产业从青蛙观光、生态旅游向影视、媒体延伸。

如今，桃米村实现了华丽转身，每年产值超一亿五千万新台币（约3500万人民币）。周末和节假日，日接待游客达1500人，平时每天也有500人左右，仅门票收入每年就超200万元人民币。生态产业成为主要产业，五分之一村民经营生态产业，传统农业也因生态旅游带动升值。桃米村还向外输出生态产业和文化，助力其他地方发展。其成功关键在于村民思维转变，创造了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生活创意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悠闲的乡村振兴之路。

四、乡村行动研究

乡村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 in Rural Areas）是一种结合了研究与实践的方法，旨在通过参与式的方式解决农村社区的实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产生新的知识。这种方法强调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学习和改进，同时促进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

1. 行动研究的核心概念

参与性：鼓励社区成员参与到研究的设计、实施和评估过程中。

合作性：建立多方合作伙伴关系，包括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学术机构以及社区内的各种团体。

实用性：研究的重点在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理论探讨。

反思性：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反思和调整方法，以提高研究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可持续性：确保研究成果能够被持续应用，并带来长期的积极影响。

2. 行动研究的主要方法

(1) 问题识别

需求评估：通过调查问卷、访谈、小组讨论等方式，了解社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需求。

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社区成员、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等。

(2) 目标设定

明确目标：基于问题识别的结果，制定具体、可衡量的研究目标。

共识形成：通过社区会议或工作坊，与社区成员共同确定研究目标和优先事项。

(3) 设计干预措施

方案设计：根据目标设计具体的干预措施，如培训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倡导等。

资源规划：确定所需的资金、人力和其他资源，并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

(4) 实施干预

动员参与者：通过宣传和动员，鼓励社区成员积极参与到干预措施的实施过程中。

执行计划：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和责任分工，逐步实施各项干预措施。

(5) 数据收集

定量数据：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式收集定量数据。

定性数据：通过访谈、观察、案例研究等方式收集定性数据。

记录过程：详细记录干预措施的实施过程，包括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6) 反馈与调整

定期反馈：定期向社区成员和合作伙伴汇报进展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灵活调整：根据反馈结果及时调整干预措施，以提高其有效性和适应性。

(7) 评估与总结

效果评估：通过对比干预前后的数据，评估干预措施的效果。

经验总结：总结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提炼出可以推广的最佳实践。

报告撰写：撰写研究报告，详细记录研究过程、结果和建议。

乡村行动研究不仅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还能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增强社区的自主发展能力。这种互动式的学习过程使社区成员不仅能够获得直接好处，还能在未来更好地应对类似问题。

拓展阅读：影像发声法

1992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学者 Caroline Wang（王丽华）与 Mary Ann Burris（博瑞思）在云南山区开展的农村妇女健康项目，首次系统应用了“影像发声”（Photovoice）方法，开

创了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先河。这一实践不仅推动了公共卫生领域的革新，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里程碑。

在 1990 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地区面临严重的生殖健康问题，但传统调研方式难以触及文化敏感议题。Wang 与 Burris 突破性地采用“影像发声”技术，将相机作为赋权工具，向云南贫困农村妇女发放设备，鼓励她们自主拍摄反映生活状态的照片。这种“以影像为语言”的方法，打破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壁垒，使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妇女能够通过视觉叙事表达真实需求。

项目主要包含三个核心阶段：第一阶段，影像采集。鼓励妇女拍摄涉及生育、疾病、家庭劳动等主题的照片，例如用镜头记录分娩时的传统接生方式、因交通不便导致的就医困境等具象场景。第二阶段，批判性对话。通过组织小组讨论，妇女们对照片进行解读，揭示隐性社会问题。如某张拍摄于雨夜求医路的照片，引发了关于山区医疗资源匮乏的集体讨论。第三阶段，行动倡导。研究成果形成政策建议报告，推动当地政府改善乡村卫生所设施，并培训接生员。部分照片被选入国际妇女健康会议展览，引发全球关注。

“影像发声法这一次参与式行动研究，融合批判教育学、女权主义理论，开创了‘视觉民族志’新范式。其‘参与-赋权-变革’三阶模型，成为社区研究的标准工具。在中国语境下，项目验证了弱势群体通过视觉媒介实现自我表达的可能性。后续研究显示，云南项目使目标村庄的孕产妇死亡率下降 37%。至 2020 年，基于该方法的研究文献增长至 1896 篇，应用领域扩展至教育、环境治理等领域。例如上海 T 村的外来务工母亲形象项目、厦门双困户影像发声计划等，均延续了该方法的批判参与精神。

这一案例证明，将技术工具与参与式方法结合，能有效激活边缘群体的主体性。正如 Wang 所言：“当沉默者拿起相机，他们不仅在记录现实，更在重构定义现实的权力结构。”

这个项目对当前中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智能手机普及使影像采集成本降低，可复制性强。如 2022 年上海公益组织运用影像发声开展西部妇女健康筛查，通过 HPV 检测照片记录推动政策优化。影像发声构建的“证据-对话-行动”链条，契合“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深圳、上海等地的社区更新项目已尝试引入该方法，通过居民拍摄的“问题地图”精准定位改造需求。

以上集中介绍了公益组织在乡村工作中可以采用的工作手法。每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后面，均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支持。每一个系统的方法论虽然有不同的技术倾向，但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都会强调社区参与的重要性，都会关注村民的意愿和村庄的需求等。所以在乡村工作中，不必拘泥于采取哪一种工作手法，而应该根据村庄实际情况，采取更加多元、更加富有成效的组合方法，以更好地适应村庄工作环境，达到振兴乡村的工作目标。

第四章

公益组织的公益项目

乡村振兴是一个跨时代、持续性的社会议题，是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建共治的合集，每个公益组织、公益人都怀揣着梦想，期待在乡村的舞台大展拳脚，践行自己的公益理想。然而，在政府、企业、村民、捐赠者等各方之间，无论是时间陪伴上，还是资金投入上，公益组织的力量往往是比较有限的。这就需要公益组织进入乡村时，首先应该明确我们的初心，即机构的使命愿景是什么？我们希望为乡村带来什么改变？我们坚持的乡村理想是什么？其次要明确我们的能力，即自己机构的专业技能是什么？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有哪些？我们可以陪伴乡村多少年？最后还要明确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即村民到底需要什么？村民关注的是什么？在意的是什么？最紧迫的需求是什么？

带着思考进入乡村，在明确了初心、能力和需求的基础上，公益理想可以转变成一个可落地、可执行、可衡量的公益项目。公益机构应该充分利用善款，将资金用在刀刃上，并尽可能地撬动政策、整合资源，发挥自己社会工作的专长，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赋能支持。与政府、企业相比较，公益机构更适合承担资源整合者、服务提供者和乡村支持者的角色，链接政府、企业、学术机构、爱心人士等多方资源，为村民提供专业细致服务，并探索适合乡村发展的创新解决方案。这个角色，要求我们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秉持关怀弱者的公益天性，平等公正对待每一位村民的同时，可以适当向弱势群体倾斜；树立正确的乡村观，既要看到乡村存在问题，又要善于发现乡村之美。

一、规模化 VS 小而美

在公益项目实践中，“规模化”和“小而美”是两种不同的策略，各有优势和适用场景。选择哪种策略取决于项目的具体目标、资源状况以及社区的实际需求。规模化的特点有：

(1) 往往基于项目操作的标准化，可以覆盖更多受益人群，边际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有助于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从而推动政策的改变和行业标准的更新，助推社会的变革。(2) 往往相对复杂，统筹操作难度更高，难以快速适应新的变化。(3) 很难关注到每个乡村的

独特需求和文化背景，从而项目可能会因为不同村庄的个性化问题导致项目质量差异较大。小而美的特点是：（1）往往针对乡村的实际情况，制定系统的干预策略，更加贴近实际。（2）项目易于调整和改进，能够迅速应对新的挑战 and 机会。（3）可以鼓励社区成员积极参与，增强归属感和责任感，乡村参与度更高，成功的小型项目可以作为案例推广，激发其他社区的学习和模仿。（4）往往关注点更加聚焦于某个板块或者某个社区。（5）仅能解决局部问题，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果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支持，小型项目可能会面临中断的风险。

公益组织参与乡村工作时，建议在规模化和小而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有一定的体量规模以保证影响力，又保持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地方特色。但无论选择“规模化”还是“小而美”的路径，关键在于明确项目的核心目标，合理规划资源，同时密切关注社区的需求和反馈，不断优化项目的设计和实施。

二、大产业 VS 小生计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产业和村民生计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又很重要的议题。围绕乡村产业发展，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文件，鼓励支持乡村产业向“一村一品”、“一镇一品”和“一县一品”的方向发展，各地充分挖掘和利用地方特色资源，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或手工艺品品牌，以此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并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大产业发展在政府鼓励、资本推动、企业引领之下，可以为乡村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同时也可能对乡村传统的生计方式造成影响。

大产业发展的项目，有助于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减少劳动力外流，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有利于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提高本地农产品的市场议价能力，提高销售量和收益，增加村民收入。但是大产业发展，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使本地产业更加单一，抗风险能力减弱，对土地要求更多，对环境的要求更高，可能会造成一些征地、环境污染等问题。如果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部分群体无法享受发展成果。大产业和小生计各有优势局限，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经济生态。在现代社会，两者不是简单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协同发展的关系。

在乡村工作中，建议公益组织更加关注村民的生计问题，既引导村民的生计与当地的大产业相结合，又鼓励村民发展多种类型的经济活动，避免过分依赖某一特定产业，以降低风险。同时建议关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可持续问题，关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建议积极引导构建透明的利益分享机制，保护村民的利益，确保所有村民都能从发展中受益。

三、兜底户 VS 贫困户

乡村发展工作中，兜底户和贫困户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这两个概念虽然有一定的重叠，但它们代表了不同程度的贫困状况和社会支持需求。“兜底户”通常指那些生活极度困难，几乎没有自我改善能力的家庭，他们往往没有劳动力，缺乏收入来源或家庭成员有重度残疾等特殊情况。兜底户主要依靠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提供基本的生活补助、必要的医疗服务和药品补贴以及居住、教育支持等，维持家庭生活所需。但是兜底措施过于单一或持续时间过长，可能导致部分家庭形成依赖心理。“贫困户”是指收入水平低于国家规定的贫困线，但仍具有一定劳动能力和改善潜力的家庭，他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扶持和发展机会逐步实现自我脱贫。在扶持贫困户发展上，政府有技能培训、小额贷款、促进就业等诸多的帮扶手段。但贫困户的发展意愿和自我改善的能力，以及市场上抗风险能力往往不太稳定。

兜底户和贫困户的分类存在，说明乡村不是一个平面，而是包含着多元复杂的群体构成。从经济水平上，可以分为兜底户、贫困户、富裕户等；从血缘上，可以分为不同的大姓、家族；从地缘上看，可以分为不同的小组、生产队或者自然村。所以建议公益组织在村内结合自己的使命愿景，找到真正的帮扶对象，并结合乡村的实际情况，多层次多维度运用干预策略。乡村振兴的帮扶对象首先是有发展意愿但缺少发展能力或机会的村民。

四、乡村的成功 VS 失败

乡村的成功和失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可以对乡村成功或失败有非常多元的认知。从人的发展角度来看，成功的乡村应该是村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且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反之，则是乡村人口流失，经济衰退凋敝。不过，这些都是笼统而模糊的认知，很难通过明确的标准来判定，也很难通过明确的数据来显示。按照国际惯例，城镇化率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指标，然而城镇化还意味着乡村人口的流失，甚至是乡村的消失。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66.16%，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参考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城市化率在80%左右，中国的城镇化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仍将逐步提高，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乡村人口的外流、部分乡村的消失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现在有很多大城市的近郊，正在加快城镇化，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内部或许还有一些保留村名的城中村，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农业用地，没有农村户口，没有农业产业，已是城市的一部分。还比如一些特别偏远的山村，时代发展催生了个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动力，也带来了不断宽松的移动环境，曾经被局限于乡村社会的个体越来越多地离开家乡，进入城市，人口流出也会导致一些乡村自然消亡。但是这两类消亡，或许并不是乡村的失败，而是乡村的升级。

在这种大的发展趋势下，公益组织在乡村工作时，需要辩证看待乡村人口的流失以及自然村庄的消失。公益组织可以思考如何更好地稳定农业产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以及食品安全；如何更好地增进村民的福祉，既充分回应留守村民教育、医疗、环境、养老等公共需求，又为村民提供有效赋能，创造公正机会，增强自由选择和自主发展能力。

五、公益组织如何做好乡村项目

以上思考，其实并没有标准的答案。乡村工作的内容、解法也需要因地制宜，但是公益组织需要有沉着冷静的意志，来思考乡村的成功和失败；需要有足够丰富的智慧，来识别乡村帮扶对象的真实需求；需要有洞若观火的敏锐，来整合各方资源，将村民生计与当地产业相衔接；需要有高瞻远瞩的谋略，将小而美的务实与规模化的影响相结合，从而真正发挥公益项目的价值和意义。

那么，在乡村，公益组织应该怎么做好公益慈善项目呢？坚持系统性思维和本土化原则，结合以下的实践框架，来设计和实施公益项目是其中一种适合的方式。

第一，精准定位，锚定使命与差异化价值。每个公益组织都有自己的使命、愿景。在项目开始之初，公益组织应该通过田野调查、市场调研等，细致分析社会问题和组织的核心能力的交集，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比如有些基金会具备电子商务优势，那么可以助力乡村农产品的品牌化，有些组织擅长教育赋能，可以聚焦乡村儿童素养提升。在找到定位的同时，也要确定明确、清晰的目标，避免目标的泛化空化，比如“促进村民收入增加”可以具象化表述为“每年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 2 万单，销售额不低于 100 万元；为村庄提供就业岗位 80 个”。根据锚定开展的干预举措，确定差异化实施路径。规模化策略适用于标准化需求场景（如乡村学校基础设施改造、紧急救援包），需设计模块化项目包，通过技术工具（如数字化管理平台）降低边际成本。小而美策略则服务于文化保育、生计产业等个性化需求（如少数民族非遗技艺传承），需建立长期陪伴机制，如派驻驻村社工持续跟踪需求迭代。

第二，系统设计，构建多维支持网络。乡村是一个复杂且变化着的工作场域。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乡村治理，都需要将其作为整体来考量。在设计公益项目时，需要大产业对接市场，小生计服务民生，既要考虑市场需求，也要考虑村民的可行性。比如在协助产业发展时，构建的“公司+农户”或者“合作社+农户”模式，既需要嵌入质量控制、溯源体系等增值环节，也需要充分考虑村民的技术能力，帮助特殊困难群体（如残障家庭）融入产业链。在这一过程中，建议将村民进行分层干预。比如可以在村里建立“三级响应机制”：（1）兜底层：联动政府低保资源，提供应急物资包+医疗通道；（2）发展层：为有劳动力的贫困户设计“技能培训+小额信贷+订单农业”组合支持；（3）赋能层：培

育乡村 KOL（如妇女带头人），通过能力建设实现可持续自助。

第三，韧性建设，平衡短期成效与长期价值。（1）公益项目应该建立动态监测与调适机制。设立周期性“需求-效果”双轨评估体系，采用“参与式评估法”让村民参与评分，权重向弱势群体倾斜。比如三一基金会道童村项目，每年年底均会系统地总结和复盘上一年工作的成效和问题，并与本地村民共同调整下一年的工作计划。（2）公益项目应该提前设置退出机制。比如，有些民宿产业项目，在项目周期内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替代公益输入，初期为乡村民宿提供装修补贴，中期培训管家团队，后期转为 OTA 平台流量扶持；通过“公益创投”模式孵化本地社会组织，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平稳过渡。

第四，生态协同，激活治理共同体。公益资源介入，一定程度上已经参与了乡村治理。所以公益项目的设计和实施，第一时间需要得到当地村委、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若是可以，需要重新构建政-社-企协同创新的治理模式。比如杭州余杭青山村，组建新老村民议事会，赋予在村内投资的外村人“新村民”的身份认同，共同商讨村庄的发展事宜，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还比如有些村，设置乡贤议事机制，邀请退休干部、返乡企业家参与项目决策，例如在村庄规划中纳入乡贤的在地经验，增强方案可行性。共同的利益链接、新的数字技术的运营、知识的沉淀，都有助于真正激活治理共同体。比如浙江的“未来乡村”数字化治理模式探索，开发集成项目数据、村民画像、产业资源的数字化平台，支持跨区域经验迁移。



第五章

乡村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前述章节简要阐述了公益组织在乡村项目中可以采用的工作手法，以及公益组织在乡村发展工作中的思考，下面再简单谈一谈乡村工作者在乡村开展工作需要具备的一些基本素养。

一. 善于发现村庄的多样性和独特魅力

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自然条件，这造成了村庄的多样性，同时也是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每一个乡村的独特性。理解并接受乡村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制定策略，促进乡村发展。

第一，理解乡村的多样性。每个乡村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故事、文化遗产、风土人情，这些可能是乡村魅力的一部分，也可能为我们工作带来不便。比如，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差别很大，南方可能山清水秀，而北方则可能干旱荒芜。再比如，每个乡村的经济基础差异也可能很大，有的乡村没有主导产业，仅靠传统农业，有的乡村有比较好的旅游资源或者区位优势，轻工、文旅等二三产业发达。乡村的多样性也造成了每一个乡村的独特性，以往的工作经验可能无法简单复制到新村庄，无形中增加了工作的进入成本、沟通成本和工作难度，需要乡村工作者做好思想准备。

第二，了解和接纳现有的发展限制。项目是有一系列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在乡村，项目的约束条件更加复杂且多变。比如，城乡差距是长期存在的，特别在一些偏远的贫困乡村，交通、通信、物流等基本的现代设施可能都还不完备；老龄化严重、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等也是会长久制约乡村发展的社会难题；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构建的乡村关系网络，即使在现代，仍然深度影响村民的选择和决策，可能会让乡村工作者无法快速了解和融入乡村；个别乡村整体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可能影响着村民的生活质量和投入意愿。

第三,虽不完美,但应该看到乡村的优势。尽管乡村工作存在诸多困难和不利因素,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许多乡村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或者文化遗产,这些有可能成为村庄发展绿色产业、乡村文化旅游的基础;乡村的熟人社会,通常具有较强的社区凝聚力,有助于推动集体行动和社区治理。

乡村的不完美,不能成为难以改善和放弃努力的理由,反而更需要面对现实情况,理性看待乡村的优势和劣势,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更适合的发展路径。

总之,接纳乡村的所有面是乡村工作者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态度。

二、要有坚持的勇气和深耕的信念

乡村工作者,特别是外来工作者,在乡村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陌生的工作环境、不太融得进去的乡村氛围、语言的差异等,项目上也可能会面临资金短缺、人才流失、村民参与性不强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有勇气去面对,并努力寻找解决办法。遇到挫折时,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轻易放弃。因为乡村工作需要扎根,有效坚持才能获得回报。怎样才能坚持下去呢?

坚持,意味要适应变化。刚刚转入乡村工作环境时,需要多多学习了解当地的生活内容、语言习惯、风俗文化;需要随时掌握村庄动态,关注村民动向,发现乡村内外部环境变化时,需要及时做出工作方案调整以适应新形势;需要保持灵活开放的心态,不断学习本土知识,了解国家政策导向,学习外部先进经验,不断提高自己,以增强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更好地适应变化。

坚持,意味着要坚持长期视角。乡村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明显的成效,因此需要有耐心,制定长远策略,分阶段实施,坚持长期的投入和不懈的努力。不要迷失在短期的工作任务中,也不必纠结于项目成效的快速呈现,保持好长远发展的心态。

坚持,意味着要得到村民的认可与支持。通过公开透明的沟通,坦诚的交流,以及实际的努力和成果,与村民建立良好的关系,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只有得到村民的认可和支 持,才有可能在乡村工作中真正坚持下来。

在坚持的同时,我们要理解深耕的信念和方式。深耕,首先需要扎根乡土。真正了解乡村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和村内的社会结构等,从而摸索出适合本地的发展路径;需要深入挖掘村庄的独特优势,将优势转化为动力;需要深入了解村民的心理状态、需求期盼,因势利导激发村庄的内生动力。其次需要坚持多方合作。坚持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打破原有的单一的乡村权力结构,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合作,形成合力,

完善村庄有效治理机制；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关系，整合多方资源，实现共赢，从而推进村庄发展。第三，在专业服务领域内持续创新，持续改进。需要适应变化，不断引入新的管理技术，新的方法，推进项目持续升级和发展；鼓励创新思维，不拘泥于既定方法；保留试错空间，允许失败，允许探索；定期组织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优化发展模式。

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坚持的勇气和深耕的信念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对个人品质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团队和社会的要求。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学习和借鉴其他成功案例的经验，为乡村的未来注入更多活力。通过持续的努力和创新，可以逐步克服困难，迈向乡村的持续发展和全面振兴。

三、要保持平和心态，培育抗压能力

在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保持平和心态和培养抗压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乡村工作者需要认识到乡村发展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接受项目中可能出现的挫折和失败，将其视为成长的一部分。平和的心态，需要设定合理的预期。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目标，避免过高的期待导致失望和挫败感。需要学会积极应对压力。学会管理自己的压力，劳逸结合，通过交流、运动、劳动、兴趣爱好等方式，缓解压力；鼓励构建乡村工作网络，与同事、朋友或家人多分享感受，互相支持和帮助。需要保持积极乐观。相信方法总比问题多，相信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多关注项目中的亮点和成功经验，从成就感中汲取正能量；保持开放的态度，尝试更多新的思路、策略和方法。

在乡村工作中，抗压能力是公益人应对复杂环境、保持行动力的重要能力。这种压力不仅源于资源短缺、文化差异、村民质疑等外部挑战，更来自对自我价值的反复叩问与现实与理想的落差。强大的抗压能力表现为：既能接纳乡村事务的非线性发展规律，在资源掣肘中灵活调整工作策略，又能通过认知重构将短期挫败转化为长期信念；既需构建“情感支持-专业赋能-资源补给”三位一体的支持系统，也需通过身体能量管理（每日冥想）、技能迭代（学习方言）和正向激励（记录村民微小改变）实现身心韧性提升。最终，压力将会转化为创新动力。

保持平和心态和培养抗压能力是参与乡村工作不可或缺的能力素养，能使乡村工作者在面对挑战时保持冷静和专注，也有助于项目率队人提升团队的士气和效率，更好地应对乡村发展过程可能出现的困难，以坚定步伐走向乡村振兴的宏大目标。

四、坚持原则，不高高在上，也不低声下气

在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坚持原则、不高高在上也不低声下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还能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坚持原则要求公益团队坚守道德底线。乡村工作面临的环境可能错综复杂，公益团队应该设定清晰的道德底线，拒绝任何形式的腐败和不正当行为。通过实际行动树立榜样，赢得村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坚持原则要求公益团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了解并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执行项目，确保项目合法合规，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坚持原则更是要求公益团队明确价值观。需要确定团队和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和原则，例如公平、透明、可持续发展等，将自己的价值观落实到项目中，坚守到日常工作中。在所有决策和行动中坚守这些原则，确保项目的方向正确。

在乡村工作中，坚守原则，并不意味着就高高在上，不与其他方沟通，而应该打破自己作为捐赠者或者资源调动者的优越感，放平姿态，与乡村建立密切的关系。与村民进行平等的沟通，尊重他们的意见和需求。避免使用权威或命令式的语言，而是采用合作和协商的方式。主动倾听村民的声音，真正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定期举行村民大会或座谈会，让村民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制定符合乡村实际情况、接地气的项目方案，避免主观臆断和一刀切的做法。与广大村民建立密切的关系，参与乡村活动，了解当地的文化和习俗，通过实际行动展示对乡村的关心和支持，真正融入乡村。

在乡村工作中，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极端，就是以低声下气的姿态，求着村庄和村民，期望把项目推行下去。反思这种工作方式，需要我们对自已的能力和项目有坚定的信心，坚信能够为村庄带来积极的变化，面对质疑和挑战时，保持冷静和坚持，尽可能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跟各方合作时，保持自尊和自重，不妥协于不合理的要求，不妥协于原则以外的要求。更需要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确保在专业领域内有足够的发言权，用自己的专业表现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

在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坚持原则、不高高在上也不低声下气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还能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持续发展。通过平等交流、倾听村民声音、融入社区以及维护自尊和专业素养，乡村工作者可以更好地推动乡村的发展，实现真正的振兴。

五、具备融入乡村生活的能力

融入当地乡村生活不仅有助于和村庄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还能确保项目更加贴近村民的实际需求，提高项目的成功率和可持续性。第一，了解当地的文化。学习地方历史，

了解村庄的历史背景、重要事件和文化传统，从而更好地理解当地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参与民俗活动，积极参与当地的节日、庆典和其他文化活动，尊重当地文化，并对这些活动保持一定兴趣。学习当地方言，如果可能的话，学习一些当地的方言或常用词汇，有助于更好地与村民沟通。第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多与村民互动，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主动与村民进行交往，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也可以通过走访、座谈等形式促进深入交流。倾听村民意见，认真倾听村民的意见和建议，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声音被重视，这不仅能增强村民的参与感，还能帮助我们获取宝贵的信息。建立信任关系，通过诚实、透明的沟通和实际行动，逐步建立起村民的信任，信任是长期合作的基础。第三，尊重当地习惯。遵守村规民约，了解并遵守当地的村规民约，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更好地融入社区，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的乡村，还应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信仰。适应生活方式，尽量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比如饮食习惯、作息时间等，与本地村民保持基本一致。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的生活环境。

融入当地乡村是我们开展乡村工作的第一步，但也需要时间和耐心。具体实践中根据现实情况，保持开放和谦逊的态度，灵活调整，向村民们学习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经验和智慧。真诚和尊重是关键，只有真正关心村民的需求，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六、驻村工作的重点

驻村工作是乡村公益组织常用的工作策略。通过长期驻扎乡村，工作人员可以更深入了解当地情况，更好地融入社区，理解村民的需求，并提供持续的支持和帮助。通过这种方式，乡村公益组织可以实现更加精准和可持续的发展目标。驻村工作的重点在于融入乡村，理解乡村，陪伴乡村，赋能乡村。具体建议如下：

1. 融入乡村

驻村工作人员应该与村民共同生活，参与日常活动。吃饭住宿均在村内，与村民共同开展劳作，跟村民共同赶集，力所能及帮助村民解决日常问题。并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与当地的节日、庆典和其他文化活动。比如参加村内的红白喜事，参加村内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给村民拜年等。鼓励驻村工作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或常用词汇，尝试用村民熟悉的语言进行沟通。

2. 理解乡村

驻村工作人员应该通过走访、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深入了解村庄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加深对所驻村的理解。主动与村民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和面临的挑战。并持续观察村庄的日常运作，记录下重要的信息和发现的问题，为后续工作提供依据。

3. 陪伴乡村

驻村工作人员通常会在村庄驻扎较长时间（数月数年不等），确保项目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此期间，通过陪伴和关心，给予村民情感上的支持，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希望。即使项目结束，也保持对村庄的持续关注，定期回访，继续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4. 赋能乡村

为村庄赋能是驻村工作重要的目标。驻村工作人员可以组织各种技能培训，如农业技术、手工艺、电商运营等，提高村民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可以帮助村民链接外部资源，如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推动村庄产业发展，可以积极参与村庄建设，如成立合作社、志愿者团队等，增强村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某些场合，可以代表村民向政府和相关部门反映问题，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

七、驻村工作前期准备

公益组织在进入乡村时，也需要做一些前期准备，具体如下：

在进入前，需进行初步调研，了解村庄的基本情况。制定详细的驻村工作计划，明确目标和任务。在进入村庄时，与村委会和村民代表进行初步接触，介绍自己的角色和目的。提前安排好住宿等基本生活，确保后续驻村工作顺利开展。

在驻村工作开始后，需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尊重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避免冒犯或误解；在跟村民沟通时，保持开放、中立和透明，及时反馈项目进展情况。

鉴于乡村工作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确保能够达成预期的工作目标，公益组织对驻村工作人员有较高的要求。这不仅体现在他们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业务能力上，还包括了个人素养方面的高标准，如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文化敏感度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章节从情感态度、知识技能、驻村工作的关键点及准备工作等多个方面，提供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建议。这些内容特别针对公益组织派遣至乡村的工作人员设计，旨在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乡村生活，迅速融入当地社区，更有效地开展工作，推动乡村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发展。

第六章

乡村振兴典型村庄简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截至 2024 年底，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拥有 691,510 个行政村，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发展历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一些村庄抓住了发展机遇，采取了多样化的策略，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案例。

本章节旨在为初入乡村工作的从业者提供一系列国内乡村振兴的典型范例。考虑到乡村振兴方式的多样性，在选择案例时力求全面覆盖不同模式，并不局限于公益组织深度参与的案例。但由于篇幅限制，未能对每一个村庄案例进行详细拆解分析。对于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读者，可以以村庄简介作为起点，进一步探索各个村庄的具体实践。

希望通过梳理这些典型村庄的经验，能为即将投身于乡村振兴工作的新手们提供宝贵的参考与启示，帮助其在各自的岗位上更好地应对挑战，推动乡村向着更加繁荣的方向发展。

（一）浙江余杭区黄湖镇青山村——从公益环保切入，以生态保护为核心，通过“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发展自然教育与生态旅游，建立新老村民之间“生态入股 + 利益共享”机制。

青山村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西北角的黄湖镇，青山环抱，绿水围绕，森林覆盖率接近 80%。青山村的乡村建设之旅始于一个水源地保护项目，随着更多新村民的陆续加入，青山村的新旧资源得到了整合与促进，村庄焕发新生。青山村积极践行“两山理论”，联合社会组织、文化力量、商业团队等构建“生态 +”协作平台，以小于 100 万的公益投资撬动近 3 亿元的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了以自然教育、美学设计等为核心的生态研学产业，吸引了以融设计图书馆、青山自然学校、莱莱竹编工作室等为代表的 20 余家文化业态及工作室入驻，培育了一批以海内外设计师、公益志愿者、文化工作者等为代表的创新创业人才，生态 + 文旅产业快速发展。

（二）河北省涞水县三坡镇南峪村——由公益基金会操盘，利用京郊区位优势，以“企业+合作社+农户”为纽带，通过盘活闲置农宅打造高端民宿集群，建立“股份分红+就业增收”利益联结机制，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创造性转化。

南峪村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三坡镇，全村共有 224 户，636 人，其中贫困户 59 户，贫困人口 103 人。该村周边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紧邻野三坡景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南峪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初，原名南狱，后因“狱”字不吉利改为南峪。该村曾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但通过村支书段春亭的带领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通过修桥、铺路和发展乡村旅游，该村逐渐振兴。2015 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时名中国扶贫基金会）经过多轮选点，在南峪村实施百美村宿旅游扶贫项目，先后建成 15 套高端民宿，民宿经营采取全体村民共享、多投多得、多劳多得和帮贫济困的收益分配方式，贫困户经过培训可以担任民宿管家，享有保底工资和绩效工资。2018 年全村实现分红 268 万元，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 7600 元。至此，南峪村彻底摘掉了穷帽子。2019 年，段春亭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南峪村在 2019 年 12 月被认定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这些荣誉的获得，得益于南峪村在公益基金会的帮助下，利用其地理优势，进行适应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和改造，通过村庄合作社对全村资源进行管理和经营，推动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三）河南信阳平桥区五里店镇郝堂村——以“三尊重”（尊重自然、文化、农民意愿）为核心，通过“内置金融”创新激活内生动力，推动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的整村活化，构建了“可持续生计+乡土文明复兴”的乡村振兴模式。

郝堂村位于河南信阳平桥区五里店镇东南部，面积约 16 平方千米，地处大别山余脉，依山傍水，自然环境优越。但却因为地理位置偏僻导致经济发展落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不够发达兴旺，2009 年前村落呈现破败衰弱景象。农田撂荒严重、年轻人口大量外流、卫生环境脏乱、公共基础设施老旧匮乏等，逐渐呈现空心化状态。2009 年当时信阳市平桥区政府主办“公民社会与现代思想论坛”，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简称“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关注到郝堂村，于是便联合北京绿十字公益组织，开启了郝堂可持续发展实验村的建设。

郝堂村的乡建实验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9 年至 2011 年，“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以“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内置金融为核心，以“四权统一”（产权、财权、事权、治权）和“三位一体”（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为主要特征的村社共同体重建实验。另一阶段是 2011 年至 2013 年，著名画家、乡建实践者孙君以“郝堂茶人家”建设为契机，以探索适应逆城市化趋势建设的“三生共赢”模式，即生产生活生态共赢的、农村农业服务业化的新农村建设实验。

（四）安徽省黟县碧阳镇碧山村——以徽州古村落生态文化保护为核心，通过艺术介入与合作社模式激活闲置资源，构建“生态+文创+旅游”产业链，实现古村活化与乡村振兴。

碧山村位于安徽南部的黟县，是众多著名的徽州古村落之一，共有面积 58.5 平方公里，至今保留着传统的乡村风貌，村内现有多座保存完好的明清时古民居和祠堂，与安徽宏村仅有 20 分钟的路程。在艺术介入之前，碧山村是典型的古村落，虽保持着古朴的村落风貌，但空间衰败，基础设施落后，老龄化严重，是一个空心村。2007 年，欧宁、左靖等人被徽州的自然乡村风光所吸引，随后用四年的时间进行考察，最终选择在碧山启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计划，碧山计划的目的是希望拓展出一种集合土地开发、文化艺术产业、特色旅游、体验经济、环境和历史保护、建筑教学与实验、有机农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乡村建设模式。

（五）河南登封市大冶镇周山村——以全国首个性别平等村规民约为治理根基，通过激活森林资源打造“生态+民宿”文旅业态，构建“妇女主导+社区参与”的乡村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中原地区生态保护与性别平等协同振兴的示范标杆。

周山村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村庄因明代从密县周渡口迁来一户周姓人家而得名。村内丘陵起伏，林木茂密，树种繁多，森林覆盖率达 95%，民居掩映，环境优美，被评为国家森林乡村。自 2002 年起，原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教师梁军及其团队开始在周山村开展工作，通过组建妇女手工小组、制定村规民约、开展多种类型活动等来提升当地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比如举行了“女娶男”婚礼、支持纯女户老人的葬礼由女儿主持，提出了“婚居自由”，“婚居模式多样化”的理念，关注村内各个群体利益，将男女平等观念贯彻始终。周山村是全国首个将性别平等理念纳入其村规民约中的村落之一，民约的出台先后历时八年。2015 年，周山村结合村庄优势，由村委出资购买废弃的老窑洞，在梁军及其团队的支持下，采用村民不用的建筑材料和老家具，打造了一个具有特色的庭院，打造“梦里老家”特色民宿。2021 年 9 月，周山村入选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名单。2023 年 9 月，周山村被确定为河南省第一批乡村建设示范村。

（六）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马海村——依托多家基金会共创共建，以粤桂协作与数字赋能为核心，通过“村民自治+乡村 CEO 培育+云认养计划”模式，整合梯田农耕文化、非遗技艺与数字平台，构建“共富乡村”文旅融合产业链，实现村集体收入快速增长并带动村民可持续增收。

马海村位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内，是龙脊壮家十三寨之一，全村共 7 个自然屯，131 户，514 人，其中壮族人口占比 86%。和大多数村庄一样，马海村人才外流严重，全村青壮年劳动力 230 余人，留在村里的只有一半左右，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

施不完善。村庄尚未形成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组织机制，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缺乏对接市场的路径。2021年，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简称SSV）为村发展实验室以“共富乡村建设”为品牌，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多方共创，以马海村为试点，共同推进开展广西龙胜共富乡村建设项目。

（七）陕西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以乡村领袖为核心凝聚集体共识，通过村民入股、公司化运营激活关中民俗文化资源，构建“全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特色文旅产业链，打造陕西乡村振兴标杆。

袁家村位于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是一个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乡村振兴的成功典范。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袁家村依托其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和关中地区的特色文化，逐步转型为一个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民俗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袁家村发展模式的核心在于“袁家村模式”，该模式强调集体经济的壮大与村民共同富裕，通过将乡村旅游作为产业发展的突破口，成功带动了当地农副产品的销售，并形成了品牌效应。此外，袁家村还积极拓展城市旗舰店和省外项目，推广其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如今，袁家村不仅成为年接待游客超过900万人次的热门旅游景点，而且实现了经济收入的大幅增长，村民人均收入显著提高，展现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良好范例。

（八）四川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以党建引领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动力，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激活资源，构建“农商文旅体融合+产村相融”发展模式，成为全国乡村振兴制度创新的标杆典范。

战旗村位于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是全国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之一。战旗村通过整合村民宅基地资源、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以及推动乡村旅游等方式实现了乡村振兴。其发展模式的核心在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资本化，包括将部分宅基地出售以获取启动资金，另一部分用于改善村民居住条件；组织农民将土地流转至合作社进行集中经营，并引入外部投资开发旅游项目，如乡村十八坊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等。此外，战旗村还注重社区与景区的联动发展，鼓励村民参与旅游相关的商业活动。这种集农业现代化、乡村旅游、文化传承于一体的综合发展模式，使战旗村从一个贫困小村转变为全国知名的美丽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

（九）湖南省新化县吉庆镇油溪桥村——以党建引领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积分制管理+三资融合+利益共享”模式，整合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本，构建“村集体主导、村民共参、产业融合”的内源式发展体系，实现从负债贫困村到全国乡村振兴样板村的蜕变。

油溪桥村位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吉庆镇，曾是一个省级贫困村。自2007年起，该村

通过实施“村级事务积分制管理”模式，有效调动了村民参与乡村建设和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这一创新的管理模式将村民日常行为与积分挂钩，并根据积分分配集体收入分红，促进了村庄治理效能的提升。同时，油溪桥村依托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和特色农产品，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产业，实现了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如今，油溪桥村已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和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展示了通过制度创新和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成功路径。

（十）湖南湘西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作为全国精准扶贫首倡地，以“精准识别+分类帮扶”为核心，通过发展猕猴桃种植、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激活内生动力，创新“飞地经济”模式与集体经济合作社机制，成为全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标杆。

十八洞村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是一个典型的苗族村落。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十八洞村时，首次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十六字”方针，为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指明了方向，从此全国开启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中国精准扶贫的首倡地之一，十八洞村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如猕猴桃种植、乡村旅游以及文化传承等项目，实现了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其发展模式强调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村民共同参与，通过“资源入股+保底分红”的方式确保村民能够分享发展成果。此外，十八洞村还注重生态与文化的保护，推动产业、文化和生态融合发展，吸引青年返乡创业，形成了以文旅产业为支柱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如今，十八洞村已成为全国知名的乡村振兴典范。

（十一）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以陶艺文创为引擎，生态筑基与城乡融合为核心，通过“艺术家驻村+文创产品开发”模式，构建“产村人文”四位一体发展格局，实现乡村经济价值与生态人文价值的协同提升，成为西部乡村振兴的示范标杆。

明月村位于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是一个从相对贫困村成功转型为特色旅游名村的典范。依托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如茶山、竹海和松林以及悠久的陶艺文化历史（特别是“明月窑”等古窑资源），明月村发展了一条以生态农业为基础、文化创意为核心的发展路径。通过引入新村民，建设国际陶艺村项目，促进乡村旅游，并鼓励村民参与陶艺制作及相关的文化旅游活动，明月村不仅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还吸引了众多艺术家与游客前来交流体验。这种结合了生态保护、文化产业与社区参与的发展模式，使明月村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一个成功案例。

（十二）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以党建引领“三权”促“三变”改革为核心，通过“七权同确”盘活资源，创新“村社一体、合股联营”模式，构建“党支部+合作社+公司+农户”利益共同体，推动农业规模化、产业多元化与乡村治理“三治融合”，实现从贫困村到“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的蜕变。

塘约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自然村落。自 2014 年遭受洪灾后，塘约村通过成立“金土地”合作社实行“合股联营、村社合一”的发展模式，将村民的土地和资源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管理和经营，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这一模式鼓励村民以土地入股，并参与到合作社的各项活动中，既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也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塘约村大力发展蔬菜种植、林下经济（如羊肚菌种植）等特色产业，同时推进乡村旅游发展。通过这些举措，塘约村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人均收入大幅提高，还改善了村庄环境，增强了社区治理能力，成为全国文明村镇及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

（十三）湖南省涟源市茅塘镇道童村——以“村企共治”为核心，通过“三产融合 + 三位一体智慧养老 + 生态治理”模式激活集体经济，构建全龄友好型乡村，入选全国乡村振兴最佳实践案例。

道童村位于湖南省涟源市茅塘镇偏西约 2 公里处。道童村作为三一集团发源地，以“村企共治”模式实现集体经济跨越式发展，2022 年收入突破 61 万元。针对全村 21% 的老龄化率，该村构建“社工 + 照护 + 智慧医疗”三位一体养老体系，为全村 600 多位长者建立健康档案，年服务量达 1.25 万人次，并完成 40 户特困家庭适老化改造。生态建设方面，通过自来水网改造、龙塘湖水质提升至世卫标准，安装 530 盏太阳能路灯实现亮化全覆盖，年减碳 42 吨，同时依托“道童微基金”完成 8 项公共空间改造。产业振兴聚焦三产融合：复耕 158 亩弃耕地种植五色糙米、淡雪草莓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打造“道童牌”水果玉米等特色品牌；建设“初心之园”等文旅地标，形成工业遗址与生态农业融合的旅游线路；新建高标准钢架大棚、冷库及电商平台，推动农产品市场化。该村入选“2024 上市公司乡村振兴最佳实践案例”，形成 102 人乡村振兴长者志愿服务队，并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为同类乡村提供“产 - 治 - 文”协同发展的可复制样本。

第七章

乡村工作的未来可能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工作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高新技术的跨界应用，不仅重塑了乡村产业形态，如智慧农业、数字治理，更催生出乡村规划师、产业运营官、生态工程师等新兴职业角色。政府、企业、学术机构与公益组织正形成创新合力：通过政策赋能搭建城乡资源对接平台，依托科技赋能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借力人才赋能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在这一进程中，乡村不再是需要“输血”的被动受体，而是成为汇聚多方智慧、创造多元价值的实践热土。我们期待更多有识之士加入这场深刻变革——无论是深耕乡土的社会企业家，还是精通数字技术的“新农人”，都能在乡村的广袤天地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篇章。

(1) 乡村职业经理人是服务于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等主体的专业化管理人才，聚焦乡村产业全链条运营，承担战略规划、品牌打造、资源整合、社群运营等核心职能。其角色兼具“产业操盘手”与“乡村治理协调者”双重属性：既要具备农业产业化思维（如品牌化运营、供应链管理）、文旅项目策划能力（如IP孵化、体验设计），又需深谙乡村社会逻辑（如村民动员、利益协调），通过差异化策略激活在地资源——在农业主产区主导“三品一标”认证与产销对接，在文旅潜力村策划“非遗活化+数字营销”融合模式。该群体亦被称为乡村CEO或新农人经理人，其专业化运作正成为乡村产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角色，推动着“资源变资产、产品变商品、村民变股东”的深层变革。

(2) 乡村规划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技术支撑力量。作为专门从事乡村发展规划的专业人员，他们通过系统运用空间规划、产业经济、生态保护等多学科知识，为乡村发展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在乡村振兴“规划先行”的工作导向下，乡村规划师的工作范畴已突破传统空间规划边界，形成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的统筹体系。其核心价值体现在：通过科学编制村庄规划，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培育特色产业促进产村融合，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乡村规划师队伍正朝着专业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政府部门通过完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创新驻村服务模式等举措，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队伍。全国多地已试点推行“规划师下乡”制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组建专家团队等方式，引导规划师深度参与乡村建设全过程。这种“陪伴式”规划服务模式，既强化了规划实施的专业保障，又促进了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正在成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推动力。

(3) 乡村社工师是构建乡村社会服务体系的专业力量，他们依托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在农村地区开展系统性社会服务。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其工作范畴已形成三大核心维度：在社会服务层面，针对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空巢老人照护、残疾人康复等特殊群体需求，建立精准化帮扶机制；在社区发展领域，通过组织村民议事会、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等方式，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在心理健康维度，运用心理疏导、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构建乡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已建成覆盖所有乡镇的社会工作服务站网络，形成“乡镇社工站+村级服务点”的二级服务体系。数据显示，全国乡镇社工站年均开展个案服务超30万例，组织社区活动超200万场次。这些专业社工通过定期走访、需求摸排，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在化解家庭矛盾、协助政策落实、培育文明乡风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其专业化服务既补强了乡村公共服务短板，更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提供了实践路径。

(4) 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主体，他们以农业为终身职业，兼具科技素养与市场意识，正在重塑传统农业生产格局。相较于传统农民群体，这类新型经营主体呈现出知识化、专业化、市场化三重特征：在生产端，熟练运用精准农业技术，通过智能传感器网络、无人机植保系统、农业遥感等数字化手段实现集约化生产；在经营端，把握农产品电商、订单农业等新型流通渠道，构建“生产-加工-销售”全链条经营体系；在发展维度，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等平台，持续提升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能力。

政策层面的制度创新为职业农民培育提供了战略支撑。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的“就地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新型职业农民”重要论述，为人才培养指明方向。农业部同期发布的《“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构建了系统化培育体系，通过“学历教育+田间培训+实践锻炼”的立体培养模式，三年间实现职业农民总量突破2000万人目标。这群“新农人”正在成为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不仅推动着农业生产方式向集约高效转型，更通过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创建区域公共品牌等实践，重构着现代农业价值标准。随着《职业教育法》修订实施，职业农民培育正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标志着我国农业从业者队伍建设进入制度化、规范化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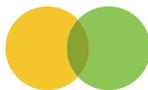
(5) 农村电商运营师是数字经济时代连接城乡产业链的关键纽带。他们通过构建“电商+产业”融合生态，系统化推进农产品价值转化。这类专业人才不仅掌握电商平台运营、社交媒体营销等数字化工具，更擅长挖掘乡村特色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形成从产品包装设计到供应链管理的全链条运营能力。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搭建城乡商品流通的数字桥梁，2022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17万亿元，其中农产品电商交易额占比突破30%；创新“直播助农”等新型营销模式，头部主播单场直播最高带动农产品销售超500万元；培育“电商+文旅”融合业态，通过短视频传播带动乡村旅游收入年均增长25%。

在实践层面，农村电商运营师已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比如在陕西柞水，电商团队通过“小木耳大产业”品牌策划，使菌类制品溢价率提升120%；在广西螺蛳粉产业带，运营师运用大数据分析重构产业链，带动上下游20万农户增收。政府主导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构建了系统赋能体系，通过建设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开展“村播计划”培训等举措，全国已培育超120万名农村电商带头人。随着数字乡村战略深化，农村电商运营师的角色不断拓展，重构着农产品流通体系，更催生出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使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持续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价值平等交换。

随着数智技术革新与城乡要素流动加速，乡村正催生出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职业形态。在金融科技赋能下，农村金融师通过设计惠农信贷产品破解融资难题；伴随民宿经济崛起，民宿管家运用服务设计思维打造个性化旅居体验；顺应康养产业发展，乡村健康管理师创新“治未病”模式构建慢性病防控体系。这些新兴职业既包含乡村旅游体验官、数字农艺师等跨界融合岗位，也涵盖农业碳汇交易员、乡村遗产保护师等前沿领域人才。囿于篇幅与主题聚焦，本文仅选取部分代表性职业展开论述。

这种职业形态的迭代升级，本质上是对乡村价值重构的积极回应。作为承载着粮食安全、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多重社会功能的特殊区域，乡村始终面临着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的双重命题。当前数智技术的渗透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更催生出“云认养”“数字游民部落”等创新业态。值得关注的是，职业类型的多元化发展正在重塑乡村人才结构——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3年乡村新职业从业者数量同比增长47%，其中35岁以下青年占比达62%，标志着乡村正从人口净流出地转变为创新创业新热土。这种职业版图的拓展，既彰显着城乡融合发展的大势所趋，更预示着乡村将成为汇聚新经济、新技术、新人才的价值高地。

结语



乡村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以系统的思维来整合资源，凝聚人心，形成合力，才有可能实现振兴。无论成功与否，项目模式为何，乡村振兴的落地地都在于村民生活是否改善，村民是否具备自主选择发展方向的权力和能力，村庄是否孕育出了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

虽然前文围绕“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振兴”这一主题，介绍了乡村振兴的常识概念和乡村发展历程，探讨了诸多思考路径、实践手法与典型村庄，也涉及了一些从业所需的基本素养、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尝试给出一定的参考建议，希望能为刚进入乡村工作的读者带来一定启发。

然而，乡村发展并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因此，本资料更多侧重于理论层面的梳理与汇总，实务操作的部分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在此，期待读者能够结合自身的信念与愿景，根据所在村庄的具体情况，灵活补充与拓展，也希望广大乡村实践者能放开手脚，在充分扎根乡土、尊重地方差异的基础上，运用实践智慧，探索出因地制宜、富有生命力的乡村发展路径。

相较于提供普适性的操作手册，我们更希望这些思考能成为激发实践创新的催化剂。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乡村振兴的本质在于尊重地方性知识，在多元共生的实践中探寻发展范式。

愿每一位投身乡村发展的践行者，都能在广袤田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解题密码，坚定信念，勇毅前行，让乡村振兴真正成为“农民主体、多方共建、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实践。

参考资料：

1. 法律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经济组织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1月2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2021年1月4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4年1月1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5年1月1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
-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2. 参考书目

-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费孝通，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 《江村经济》，费孝通，商务印书馆 2001 年。
- 《新乡土中国》，贺雪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 《探路乡村振兴的基层实践：“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2021 年案例观察》，杨团、刘建进、仝志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年。
- 《参与式社区规划与设计工具手册》，刘佳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2 年。
- 《社区营造及社区规划工作手册》，社区营造及社区规划工作手册小组，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 《城乡中国》，周其仁，中信出版集团 2017 年。
- 《中国云南农村妇女自我写真集》，吴坤仪、白梅等编委会，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5 年。
-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郑大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 《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 《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刘重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 《重塑田园：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农人返乡手记》，马彦伟主编，商务印书馆，2022 年。
- 《乡村振兴的维度》，李小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 年。
- 《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叶敬忠、刘娟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
-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杨团、朱健刚，梁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



工 作 组：乔可欣 王龙玺

校 对：马里千

设计排版：马志新

内部刊物，仅供交流

版权所有，请勿盗用

公益领域通识



乡村振兴



三一基金会
SANY FOUNDATION